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8年3月31日第6期 总第216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16期

纪念何方专辑（一）

目录

【专稿】

宋以敏 何方的底色——一个老革命的反思

【读何方的书】

启之 何方的治学与学风——浅论学者的“识”“胆”“德”

姜学斋 何方的“世纪之问”

阎长贵 史志直言昭万世——何方老对中共党史的贡献

唐燕 我们如何成了暴力革命的信徒

——读何方《对时代的两种不同判断及其后果》有感

续霜红 个人崇拜为什么长盛不衰

——何方《延安整风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读书笔记

司绛 毛泽东的误判与反日愤青的出炉

——读何方“国际形势与外交问题”有感

石名岗 也谈“何方之问”——《何方自述》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穆德冰 延安整风的文化遗产——何方谈造假与违心

【何方资料】

何方简介

学术成果

著作馆藏

【本刊声明】

【专稿】

何方的底色

——一个老革命的反思

宋以敏



何方走得迅速，走得安详。他是带着对生活的深深眷恋离开这个世界的。他似乎不无预感。去世前的一两个月里，他对我们一家三代，对他已经去世五六十年的母亲、姐姐和他还不知道已于几个月前去世的弟弟，流露出过去难得表而出之的依恋和怀念之情，做出多种有形无形的交代。

何方应该觉得，他走得并无遗憾。他读书、思考和写作几乎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去世前两个月叫我帮他买来新出版的谈王阳明和梁漱溟的书，说是要翻翻。去世前的几天还在继续修改他最后一本书稿，并最后确定书题。他一直头脑清楚，生活正常，喜欢开开玩笑的习惯也保持到了最后。李锐老多次说过，何方是个好人！许多朋友劝慰我，这是好人最后得了好报。

我的思绪至今还比较纷乱。此时写他，还是不知从何说起。何方不止一次说，我其实并不完全了解他。有可能。他生前要是看到我写下的这些，还不知会对里面多少说法不以为然呢。下面就根据自己的感受，谈谈他的老共产党员、老革命的本色吧！

何方是个党龄已达78年之长的老党员、老革命。这是他一生最在乎的身份和底色。这个底色有他心目中的内涵。他相信和忠于的党，是延安整风前那个时期的党。这一点，他一生未变。因为党所追求的民主平等自由理想，那时曾有过生动的体现。

他晚年回顾一生时喜欢说，回想起来，他这辈子竟不知快乐为何物。他一生坎坷，快乐时光确实不多。但是，从抵达延安时起到延安整风前的那三四年，应该说是他一生中

快乐的一段。对这一段，有他一生中最为美好的回忆。整风前的延安人延安事，他平时最为津津乐道。连他晚年纪念胡耀邦和李昭同志，也都要从抗大生活说起。他崇敬胡耀邦，正是觉得在他的身上，不仅体现出，还大为发展了那个时期党的各种优良作风。他曾写过文章，说党在历史上有过三段生动活泼时期，先后出现在陈独秀、张闻天和胡耀邦当总书记任内。

何方认为，党执政后应该恢复并发扬延安整风前的那种民主平等自由作风。如果说，延安整风后的党是适应暴力夺权需要的。那么，共和国成立后的党，就得按执政前郑重许诺过多年的，把中国建成和民国时期迥然不同的民主平等自由国家。结果是没有。党一直沿着整风运动定下来的那个路数走了下来，共和国成立后更越走越远。他在《党史笔记》里曾说，延安整风在政治上对全党全国的影响当以百年计。当时有老同志说，这未免也太长了吧？何方去世前不久又有新说：现在看来，百年还不一定打得住！他研究党史，重点就是想弄清这是怎么回事。

何方身上具有“三八式”一代人的许多共同性。这一批革命者是党内知识文化水平和独立思考能力都相对较高的群体。他们坚决参加革命，是为抗日，同样也是为打倒国民党独裁专制腐败政府，在中国实现民主平等自由。

在“三八式”一代中，不乏当年对民主平等自由理想的追求同日后个人政治实践脱节的现象。譬如蒋南翔当年曾上书直言，批评延安抢救运动。可在他当了清华大学校长后，却决不让学生们继承，更不用说发扬老几代清华人保持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传统。教育方针一变而为只要学生“听话”、“出活”（清华校友杨继绳语）。曾彦修老有一次在给何方写的信里说，不让“三八式”一代在党内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是“党的重大不幸”，“中共的一大悲剧”。曾老又指出，在他们身上也存在局限性：“如果‘一二九’、‘三八式’一代果真当权了，也跑不出马恩列斯一套。因为党的模式已由斯大林定型化。”

何方参加革命后，绝大部分时间做的是文字工作。在民主平等自由问题上，没有得到过政治实践的考验机会。但有一点很明确，他从未把党的领导地位等同于党的独裁专制。

不认为因为夺权胜利，党就可以为所欲为，垄断和控制国家、社会和民众的一切。他反对打江山坐江山思想，更反对用马上得天下那一套治天下。1989年“风波”后李慎之挨批判，一位红二代领导说他：吃共产党的饭还骂共产党！何方得知后对李慎之说：你就该把他当场顶回去！告诉他，没有包括你我在内这些老家伙们当年的艰苦奋斗，你哪儿能坐到今天的位置上！

何方担任行政领导，凡事亲力亲为，是当管理者，不是当官。他与下级的关系往往比与上级的关系更融洽，更合得来。他一贯说话随随便便，没大没小。在驻苏联使馆，他因此遭到一位参赞的上纲批评，却引出张闻天对他的评语：何方这个人比较直爽，没有什么心计，不搞两面派，简直像个调皮的中学生。几乎从党一开始给他做鉴定时起，何方的缺点就一直有“自由主义”这一条。连延安整风给他的“特务”冤案平反时也留有这条“尾巴”。

不过，在处理人和事的个人作风上，何方在民主平等这些问题上存在缺陷，也很明显。这既出于他的个性，也同长期受党内生活熏陶有关。

青壮年时期的何方和其他“三八”式一样，都真诚服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崇拜革命导师。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外交部五七干校，中后期有许多时间可以用来读书。何方再次系统研读从家里带去的成套马列著作。我读这类书本来就少，还读不大进去。何方当时专门为我写过一篇简明介绍《资本论》基本观点，长达近两万字的笔记，想帮我开窍。他称道马克思“怀疑一切”的哲学，同情弱者的情怀。何方一再向他的年轻同事建议读读梅林著《马克思传》，特别欣赏其中谈马克思性格特点的内容。他对毛泽东写的诗词文章佩服之至。一知道毛泽东读了什么古书古文，立即找出来反复捧读。

何方长时间都是把自己同党、同革命化为一体的。

我对何方的第一个印象是，这是个能为革命拼命的老八路。那是在1950年冬，外交部

和全国各单位一样，掀起报名参加抗美援朝热潮。章汉夫副部长在外交部老部东楼大礼堂主持大会，大家争先恐后上台报名。只有何方与众不同，特别招眼。他没着制服。穿着黑棉袄黑棉裤，戴着翻毛黑棉帽，一路嚷嚷着“我报名，我报名”，大步流星跑到麦克风前，讲了一段比谁都长的话。据张培森 1998 年 12 月 29 日做的谈话记录，何方对他说：“抗美援朝打起来后，讨论了多次，我都参加了。还有一次是报名。我上去报了名，讲了一通，表示我去抗美援朝，条件比你们谁都优越。因为我是从安东来的，那里就在朝鲜边儿上。他们都笑话我像个小孩，说何某人简单幼稚。”当时他那一身东北老乡打扮，那一副舍我其谁派头，引起全场哄笑。

我有海外关系。父亲 1948 年被民国政府的资源委员会派到台湾去当了台湾糖业公司的协理。和我结婚，何方需要报告张闻天。第一次到张闻天家，张闻天笑眯眯地和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哦，你的父亲在台湾？”可见张闻天虽不认为这是我们的婚姻障碍，却重视这个问题。大概是为了减轻我的思想包袱，何方对我说过一句话：同他结合，就是同党、同革命结下了血缘关系。

每当我问何方应该如何认识党，他对我进行的都是正统教育。驻苏联使馆支部通知我可以写入党申请报告了，问他该怎么写对党的认识？他的回答就是一句话：“伟大，光荣，正确”。问他党现在的一些说法做法怎么和过去的不一样？他说：你怎么能用党今天的政策去解释过去的政策？一切都得看时间地点条件嘛！共产党讲的就是革命的功利主义。

何方看不惯党内存在的弄虚作假、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作风，尤其反对利用特权谋取私利。他同情弱者，喜欢打抱不平。看到他认为不对的事，总会忍不住提出意见和批评。往往从“那我不客气了”开头，话有时说的挺难听。他说，当个老共，就应该这样。

他对党的思想感情，并没有因为长期挨整而改变。

在 1959 年反右倾运动中挨批，他没二话，一切都以毛泽东之是是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曾给张闻天下过五字断语——“狭高空怯私”。何方在自己的交代和检查中原样照搬，直接套用到自己头上。和我谈起来，他认为自己的确就是“狭高空怯私”。

1962年他受到甄别。外交部党委要在给他重新做的结论中留“尾巴”。他不服，长时间据理力争。这时，他在“三面红旗”问题上的认识已和1959年受批判时大不相同。他做不到像上次那样照单全收，配合和服从审查了。他坚持讲他的理。就是姬鹏飞亲自出面劝说，也不行。最后，在外交部所有被甄别人员中，以他的态度为最差。他明知也准备接受这会带来的严重后果。

“文革”一开始，他几乎立即就被外交部党委抛了出来，从此进入“牛鬼蛇神”行列。他很是听话。相继登场的“红卫兵”、“造反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还都认真努力干。包括在江西五七干校主动找体力劳动活儿做。他居然很快就成了个像模像样的木匠，上高家具厂还到他那儿取过经。他的木工成品，不少保留至今。用硬木刻成的多个刨子，如今就放在家里的陈列柜里。我们至今还在使用着他做的带靠背小马扎。他还制作了多把竹木躺椅和多个樟木箱柜。这些大都托人从干校带回北京，先后送给了他的延安时期好友，帮助照顾两个在京儿子的友人和老师。

“文革”初期，他很为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兴奋了一阵。特别拥护毛泽东反对官僚特权，让群众得到大民主、提意见的机会。他在“文革”中对部领导和一些大使的揭发，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对他们的以公谋私行为，譬如让外交信使从国外为他们自己或受托给别人带东西回来。（他在2017年6月的一次录像访谈中谈到当年一位高层领导夫人通过信使给她带高跟鞋的往事，就像当年一样地义愤填膺。说他当场就提出，应该把信使带的所有个人用品都拿出来，展览展览！这是他此生倒数第二次接受访谈。）他看到不少高级干部或退出了部分住房，或把住房从较大的换为较小的，觉得这次是来真的了。他从自身做起，辞退保姆，取出存款帮助穷朋友，做好以后长期下基层去工作和生活的准备。他也很满意中央文件一下子就能捅到大街上，说，以后就是听不到中央文件的内部传达也不怕了。他曾领着我和两个儿子，从高呼“首先敬祝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开始，在家里做过几次“晚汇报”。何方这个人从不做作，他是认真的。就连外交部抓“五一六”，因为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一开始还以为真有这么个“反革命阴谋集团”，

尽管他已有过在延安被莫名其妙地抓为特务的经历。

外交部党委 1971 年决定开除何方的党籍，1974 年又维持原开除处分不变。何方不仅不服，而且愤怒，决心抗争到底。当然，采取的形式是苦苦哀求。从被开除之日起，他就给姬鹏飞、乔冠华、王海容和军代表等部党委领导写信，承认和检讨自己的错误，落脚点都是请求留在党内。每过一段时间就写一封，前前后后也不知一共写过多少封。当然，封封石沉大海。他说，他没有“感动上帝”的意思，但是只要活一天，就要不断写下去，至死方休。

面对外交部复查组 1979 年对他的平反，何方说他这次要运用毛主席的“斗争哲学”，寸步不让了。部党委一开始还是想在给他做结论时留“尾巴”。复查组和他交涉多次。最后，部党委终于做出“在 1959 年反右倾运动和‘文革’中对何方同志的处理，都是不对的”结论。部党委对“文革”中的挨整对象承认错误，何方的案例在外交部独一无二。当然，这次有胡耀邦在全国范围主持平反各类冤假错案这个大背景。黄华取代原部党委在外交部主事，则是何方最后能够得到彻底平反的直接因素。

近年来参加一些聚会，有时会听到个别老同志发出激愤之语：党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我干脆退党算了！每当听到这样的表示，何方一定会出来反对。话是这样说的：你要退，得先准备退掉你住的房子，断掉你的医疗关系。其实他是觉得，退党能解决什么问题？重要的是要从历史和理论上弄清党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党怎样对待他，何方一直到生命最后阶段都非常在意。2016 年 5 月，中纪委驻社科院巡视组对他作“函询”调查，限期要他说明被举报的三大问题：“主张在中国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仇视毛泽东，否定建国后头三十年建设成就”。何方按期交出答复，不仅加以批驳，还对“函询”做法本身提出意见。对这件事，他表面上显得不大在乎，实际上内心受到极大震撼。一天夜间，他竟然行为反常，半夜起床到处翻找安眠药吃。我闻声到他的卧室去阻止。他一见我就大兴问罪之师，说：“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我的一片纸（指他对“函询”的答复），怎么就给弄到了网上？你是要把我整死啊？”这句话，他翻来覆去说个不

停。两人一夜无眠。

到了晚年，何方的思想来了个飞跃，对问题想得越来越明白。

思想观念所以能发生大变化，同他进行反思时，不回避自己在党内生活经历中的错误行为和错误认识分不开。

他说，他一生犯下了两大政治错误，一个是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承认自己是特务，另一个是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揭发张闻天。这两件事都不仅违背他的本性，揭发张闻天，更伤害到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老领导和恩师。“文革”结束，1978年何方见到了一别近二十年的刘英同志，十分愧疚地向她检讨当年对张闻天的揭发。当时，他一生罕见地流下了眼泪。后来又了解到当时张闻天对他有过伤心失望表示。萧扬告诉何方，张闻天听说他在1959年外事会议上站出来揭发了，说不知道何方他们都（瞎）说了些什么；船要沉了，都要溜了。刘英告诉邓力群，张闻天知道何方揭发后，心里凉了半截。邓力群本人也跟何方的一位延安老友说过，何方对张闻天的做法不对。何方本来就深深自疚，听到这些，越发不能原谅自己。

这种无法摆脱的内疚和自责成为他学习和研究党史的原动力。他从厘清张闻天在中共党史上的真实领导地位和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开始，联系自己在抢救运动中的遭遇，剖析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全过程。他对毛泽东的新认识，由此形成。

何方的认识有个发展过程。

入党伊始，何方就发现党内存在着一些他当时就觉得很怪的现象。诸如竟然还存在专门监视党员思想活动的秘密党员。对王实味的文章，大家几乎一夜间就从支持变成反对。更不用说延安抢救运动之荒诞了。共和国成立后，对于1959年前发动的各种大小运动，他既非当事人，也基本上没有参与，但深知其中怪问题怪现象层出不穷。例如连个扫盲运动都会死人。当上张闻天助手，可以读到政治局委员传阅的机密文件，对党内国内出现的各种问题知道得就更多也更具体了。但对所有这些都见怪不怪，有时还当作笑话来听来谈，未曾想过去探究出所以然。何况当时他的主业是国际和外交问题研究。

1960年在安徽亲见大批饿死人现象，自己也差一点饿死，是他在认识上发生大转变的开始。他这才察觉毛泽东和党在路线上出了大问题。党怎能忍心让自己一向依靠和信赖的农民等人民群众成批地去饿死？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怎么样也解释不通。

也就是从这时起，即使处境一直很差，他也开始关注起过去没有下心想过的问题，重新思考他曾经认定没错或视而不见的一切。譬如延安整风运动确立了共和国成立后治党治国的固定模式而贻害无穷的看法，那时就产生了。在忍不住时他会和我嘟噜几句。说，抓“五一六”简直就和延安抢救运动抓特务一模一样；《国际歌》讲从来没有救世主，《东方红》唱人民大救星，岂不自相矛盾？等等。只是我那时最怕何方“错”上加“错”，总是制止他胡想乱说。话不投机，他当时没法儿也不敢和我多说什么。

“文革”后，何方重新操起国际问题研究旧业，他把主要精力投了进去。写了大量报告和文章，参加了无数次国内外对外学术交流活动。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在刘英的主持推动和胡耀邦的具体支持下，围绕张闻天在党内历史地位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开张。何方不仅自己研究，还参与了张闻天文集编辑组有关工作的领导。这两方面的思考和研究齐头并进，何方越来越能做到从世界看中国、看党史和国史。

把党的历史和现状、中国和世界、自己所学所信的理论 and 实际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重新思考和研究的结果，使何方在年近八十后逐步形成了一套基本观点，那就是：在世界比较下，共和国成立后头30年的建设是停滞是倒退。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对时代问题判断错误。在中国之所以竟能在和平时期出现饿死三四千万人的大惨剧，接着又发生摧残生命、灭绝人性、毁灭文化、掠夺财物的“文革”大灾难，关键出在国际共运的百年实践。列宁通过共产国际确立了领袖独裁的党国体制。毛泽东又发展了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 and 实践，创造出具有中共特色的继续革命理论和一切依靠运动解决问题的实践经验。因此，中国要跟上经济市场化加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早日实现宪政民主，必须从重新认识和研究毛泽东开始。

何方的思想结晶，就是他2000年以来写的《论和平与发展时代》、《党史笔记——从

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历史要真实》（香港大山出版社出版时更名为《党史真相》）、《谈谈毛泽东外交》这些书。

何方晚年的研究工作得益于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的有利政治环境。

对外开放要求必须彻底放弃外交工作以国际阶级斗争，也就是以世界革命为纲的路线。了解一个真实的世界更成为一种迫切需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际问题研究出现过一段空前活跃时期。在这个领域，当时上上下下都开始解放思想，讲求实事求是。胡耀邦和赵紫阳都非常重视而且大力提倡研究工作。中央和研究界之间有沟通有交流。研究者畅所欲言的空间较大，重要研究成果能够得到中央的重视乃至采纳。

何方的晚年反思，一直从诸多老同志和远比他年轻的历史学者的言谈著述中得到重要启发和帮助。《党史笔记》一书的注释，征引旁人发现的重要史料和研究成果数量很大，其中许多出自中青年学者。高华和杨奎松的著述是他引用相对最多的两位。在国际关系和外交问题领域，李一氓是他的恩师。宦乡对他的帮助也不小。沈志华辛苦收集的苏联解密档案资料和本人的著作，既印证了他早已形成的不少看法，又给了他一些新的启示。国际问题研究界一大批中青年才俊的著述也是这样。

何方的朋友圈子一向比较窄小。长时间主要就是他的延安时期老友、外交部门和中国科学院的同事。和朋友们交往，何方又一向不大主动。离休后，通过丁东等热心朋友们的主动联络，何方的朋友圈子得以迅速扩大。这使他晚年生活得比青壮年时期远为丰富多彩。他获得了宝贵的友情，远超过青壮年时期的社会尊重，一生中稀有的快乐。这成为提高他写作积极性的重要因素。朋友们为他提供了参加多种思想交流活动的机会，督促鼓励他写作，给他写出来的东西提意见，还在发表、出版和推介上多方给予具体帮助。在告别何方时，有那么多老少朋友们前来悼念，还有那么多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在网上发表纪念诗文！我深受感动！在此，让我向各位朋友表示我们全家的深深感谢！■

2018年2月5日

【读何方的书】

何方的治学与学风

——浅议学者“识”“胆”“德”

启之

在“三八式”一代知识分子中，何方的学历如果不是最低的，也是最低的之一。而在“两头真”的老革命中，何方的著述如果不是最多的，反思如果不是最深，那么，也是这最多最深的之一。从最低到最多最深，靠的是什么？是自学。

何方曾有一篇文章谈自学的体会：要有强烈的求知欲、广泛的兴趣、挤和钻的精神；还要持之以恒，联系实际，学用结合等等。¹ 这些貌似老生常谈的经验，凝聚了何方一生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标引着一个初中生成为学问大家的路径。

古人说，“才、学、识、胆、德”是做大学问必备之条件，何方的才、学这里不说，只说他的“识、胆、德”。识，是见识，或者识见。有人说是思想。不确。准确地说，就是与众不同的判断力和洞察力。所谓“群行群止看识见”，就是指有独立的见解，不趋止从人，俯仰随众。何方治学有几个特点，首先是独立思考。他在给日本研究所讲话时，提出三思，其一是多思，“就是敢于突破旧框框，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他告诉研究人员，所谓立说就是创新，“没有新意的文章不要写”。²

问题是，有新意还要有胆魄。胆，是胆量和魄力。有些人的思想突破了旧框框，但是不敢诉之笔墨；很多老革命心里想的，只能在私下说说，一公开就退避三舍，畏首畏尾。我曾采访过上百余位八十以上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一看到摄录机就改了口，思想没有了力度，言论没有了锋芒，与当下不同的史实也不再提及。

何方有识有胆，真知卓见与果敢勇毅兼备。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道人之不曾道，言

¹ 《也谈点自学的体会》，载《何方集》页376-383，中国社科，2001。

² 《在日本所两次聚会上的发言》（原载《东北亚学刊》2011年第2期，《何方杂谈》页245-248，自印书，2012。

人之不敢言。但他并非大言耸人，而是有理有据，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拿出“新论据”“提出新看法”。¹同样的观点，何方思考得更缜密，更严谨，更全面，因此也更有说服力。

《历史决议》把毛思想归纳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三大特点。何方质问文件的制订者：“从建国后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到文化大革命，以及这中间不断的各种运动，又有哪些和在多大程度上是实事求是的呢？”他以延安抢救为例，尖锐地指出：“毛主席提出实事求是之日，也正是在内部大规模实践不实事求是之时。这个词汇的新解（《改造我们的学习》）发表于延安整风开始的一九四二年三月。四月，毛泽东就提出审干和肃反，紧接着就是批判王实味和普遍开展审干和抢救运动。在一个短时期内，把多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打成特务，这能算实事求是吗？”何方一语破的：“把实事求是列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特点，这本身就不够实事求是。”

关于第二个特点群众路线，何方指出，《历史决议》所说的走群众路线“在三年困难时期已经完全变成了讽刺。而且追溯到以前，不但大跃进、公社化、反右倾、刮共产风绝对不是走群众路线，就是反右派、反胡风，以至三大改造，都谈不上走群众路线。”“何况群众路线只是个工作方法，封建社会的一些清官，甚至好皇帝都多少懂得这一点。”

第三个特点独立自主，何方不无讽刺地说：这个独立自主“那时还真地实践了一个时期。这就是完全摆脱了一边倒，走自己的路，不仅同苏联破裂，而且近乎全面出击，同帝修反斗，支援世界革命。结果造成外交严重失误和孤立。”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为了支持世界革命，“不顾人民死活继续出口粮食，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零年就分别出口三四百万吨，困难时期每年用外汇买黄金几十万两作为储备。”《历史决议》“关于内政错误和外交正确的说法，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实际上都是站不住的。”而“外交上的独立自主也就实行了那几年，后来又很快联美反苏了，所以给毛泽东思想加上这一特点也实在勉强。”²

何方的这些看法，令人脑洞大开。事实上，实事求是跟后来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

¹ 《何方杂谈》，页 246。

² 《何方自述》（上），页 379-381。

的唯一标准”一样，本来应该是生活常识，社会常规和人类常态——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不实事求是能长久自立于世？“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绝非毛的独家秘笈，更不是中国党的独创。在“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掩护下，从红卫兵的抄家打人，到草菅人命的“群众专政”，毛泽东这一“活的灵魂”成了祸国害民的一大法宝。至于独立自主，其实是另一种闭关锁国，它与反帝反修相结合，把中国推向了贫困落后的深渊。总之，《决议》把它们列为毛思想的基本原则，一方面是“闭着眼睛说瞎话”，把不是当理说；另一方面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本想给中国党增光添彩，却只是证明了中国党的理论水平之低。因为它用《历史决议》的郑重方式鼓吹的毛思想，在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不过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几个套话的简单重复。”¹这个决议再一次印证了，科拉夫科斯基的论断：“毛主义是激进的农民乌托邦”，它“使用很多马克思主义的词语，但所用词语的主要意义却似乎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²

何方的这种胆识体现在他对毛、邓等人的评价上，更体现在他对外关系上。比如，他一反邓小平的说法，一针见血地指出：“中苏分裂主要责任在中国党，亦即在毛泽东。”同时，他还大胆推翻了把日本的统治者说成是侵略者，而把日本人民说成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的“阶级分析法”，他告诉人们：“日本的对外侵略是日本的民族犯罪，阶级分析法（把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民众）区别开来是不明智的。欧美人，包括德国人，认为德国法西斯的胡作非为，既是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的罪行，也是整个德国民族的犯罪，才有近乎全民的普遍反思；才有禁止军国主义和法西斯活动的法制。”³这一看法，与日本著名的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新岛淳良暗合。⁴可见毛泽东从列宁那里接收下来的“阶级分析法”连侵略者本国的人都无法接受。

¹（波兰）莱泽克 科拉科夫斯基著，唐少杰等译：《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三卷）页 480，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

²（波兰）莱泽克 科拉科夫斯基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三卷）页 476，出处同上。

³何方：《我的学术自传》（作者注：此文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集》之约而写）

⁴见新岛淳良《我的毛泽东》，野草社，1979年版。旅日华裔学者刘燕子译。

同时，何方的胆识还表现在他对《历史决议》其它内容的批判上——

在中国，长期以来，大的错误实际上是不能讲的，甚至明文规定有些问题不能碰。……在第二个历史决议中虚晃一枪后再也不愿公开承认是搞错了。对这些错误既不能加以肯定，就只能来个鸵鸟政策，不加评论，实际上也禁止评论。¹

今天讨论的这个《决议》，我说一点离经叛道的话，它的最大缺点是设法掩盖建国头三十年的错误。邓小平对埃塞俄比亚的门格斯图说过，我们犯了二十年（实为三十年）“左”的错误，表现在经济没有发展，人民生活没有改善。²

这两次“历史决议”都是为个人崇拜服务的。1945年的“决议”是确立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似乎是毛一人在只手打江山。而且不少地方还掠人之美。第二个历史“决议”，是为了维护对毛及其战友的个人崇拜。邓小平和陈云就一再说过，如果这次不把对毛主席的评价“一锤子敲定”，那连我们这些人也是会被否定的。……可见，做“历史决议”，完全是活着的领导人为党的领袖和他们自己预作身后结论，使以后的党史只能以此为准。³

何方不但善于用当权者的话，揭露《决议》的内在矛盾，而且善于联系现实：“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正式说法是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继续依靠暴力维护党的一党专政，包括依靠军、警、国家安全等强力部门对全社会实行监控。按政治和思想标准不断制造新的“阶级敌人”，还在继续。一位国家级智库的负责人在2012年7月3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把‘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分子、网络领袖、弱

¹ 《一个郑重的党应该习惯于做自我批评》（在《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的发言稿）。

² 《对几个历史和理论问题的一点新认识》（2016年1月20日在《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的发言）。

³ 《在〈历史决议〉发表30周年讨论会上的发言》。

势群体’这五类人定为美国渗透中国依靠的核心力量。”¹

对中共的基本理论，何方也表现出了深刻的洞察力——

关于暴力革命。是否能够推动社会进步，是衡量革命正义性的标准，暴力并非唯一手段。俄国的新教科书已把“十月革命”正名为“十月政变”，其正义性已受到质疑。²

“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导致了建国后头30年的全面倒退。一个明弃暗保，一个名正言顺地在继续坚持。³

专制政治的共性之一，就是只提倡从本国看世界，忽视从世界看本国。在这类国家，往往根据本国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来观察、评价和对待外界事物，总是把自己看成或者说成比外国强。⁴

何方的识见之精微，还常常表现在某些人们习焉不察的事物上，比如，何方告诉人们，所谓五七道路，五七干校云云，不过是毛泽东“用来消灭城乡差别，倒转历史车轮的超级幻想。”⁵党史和媒体把抓捕“四人帮”吹得神乎其神，好像“四人帮”有多大能量。其实毛一死，抓“四人帮”“简直跟瓮中捉鳖一样容易。”邓小平承认毛没有弄懂马克思主义，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中共中央却把毛封为中国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说毛的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⁶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一般来说，岁数大了，思想趋于保守，容易死抱着年轻时的东西。何方不然，他的成

¹ 《对几个历史和理论问题的一点新认识》（2016年1月20日在《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的发言）。

² 同上。

³ 同上。

⁴ 何方：《我的学术自传》（作者注：此文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集》之约而写）

⁵ 《何方自述》（下），页527-529。

⁶ 《何方自述》页751。

就都是在他进入耄耋之年之后取得的。作为一个被洗脑半个世纪之久的老革命，何方能从教条和思想禁锢中走出来，在晚年来了一个认识的大飞跃，全凭其胆识的高迈超绝。

何方为什么有此等胆识呢？这就涉及到“德”。何方认为“德”就是做人：“要把做人与做学问很好地结合起来。做人和做学问历来是统一的，一个学问上有所成就的人，必然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为人善于投机取巧，做学问必定会弄虚做假。”何方是这样做人也是这样做学问。但是，有无数相反的例子，证明何方的这一说法有问题——郭沫若大学问家，但名列“四大无耻文人”；周作人学问也好，成了文化汉奸；季羨林被封为学术大师，但他的寡情和不判是非，与其学问也统一不起来。¹相反，没学问或学问一般的人之中，正直诚实之士多得很。可见，做人与做学问不宜简单地划等号。

做人是一个极其广泛的概念，从“三观”到处世为人，从思想方法到性格作风，都在做人之中。做人与做学问有关系，但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学风上。所谓学风，就是遵守学术规范，讲究学术道德，包括引用别人的话要注明出处；不抄袭剽窃别人的成果。不利用权势在别人的著作上署名等等。

在这些方面，即使像李泽厚这样的学术大家，整天反对学术腐败的人，也有可指摘之处。王若水告诉人们，最早提出“革命压倒启蒙”和“救亡压倒启蒙”观点的其实是美国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1986年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时，并没有说明这一点。²高尔泰则指出，李泽厚本来是主张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统一的，可是为了与高争夺署名权，非要在《中国哲学年鉴》上把自己的名字挂到“主观论”的名目下。高在文章中说大陆的“美学研究的中心是美感经验，论题是在对别人的批判中展开”，李泽厚却“在《美育》杂志上公开宣称，中国的美学讨论从来

¹ 季承：《我和父亲季羨林》，页120-150，新星出版社，2010年。

² 王若水：《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4期。王若水在注释中提到，舒衡哲现为美国威斯里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八十年代初曾与李泽厚合作。她写过《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和五四遗产（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该书于1986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有中文译本，中译本作者名译为微拉·施瓦茨。她在给王若水的信中强调，事实上是她先提出“救亡压倒启蒙”这一问题及相关观点的，李泽厚在自己的文着中使用了这一观点却未提及她的名字。

没有过政治批判。只有他的、蔡仪的、朱光潜的三种观点的平等商榷。”¹ 众所周知，美学界是政治批判的重灾区。李泽厚把批判他的人分为“可耻”、“可怜”、“可笑”三类。蔡仪被列入可怜之中。² 李泽厚为什么会无视事实且不顾前后矛盾呢？是为了打压新秀高尔泰？还是为了调整与论敌（蔡仪、朱光潜）的关系？抑或是顺应八十年代中期的政治形势？做人与做学问的复杂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何方是著作等身的知识分子，但是，他身上没有这些知识界常见的毛病。他不计较功名，没想过自己在学界的“名次”和“历史定位”，更没有学人的虚荣心。他身上有前辈学者的遗风，有老革命的奉献精神。

何方告诫日本所的青年人：“在当今的世风下，强调树立真正正直的学风极为重要，要竭力防止和坚决反对一些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侵入神圣的学术殿堂。”³ 何方以身作则，他写文章，找资料，一切自己动手。成文后广泛征求意见，再根据这些意见考虑修改甚至重写。更难得的是，不管他付出多少辛劳，也从不在自己主抓的项目上署名。

2016年5月，中纪委驻社科院巡视组对他作“函询”调查，要他限期说明被举报的三大问题：“主张在中国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仇视毛泽东，否定建国后头三十年建设成就”。这个巡视组所禀持的理念，就是立党为党的理念。何方按期交出答复，不仅加以辩驳，还对“函询”做法本身提出意见。

这是一个“三八式”老革命的底色，他真正做到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与陈云等大佬们不同，他入党为公，不为子女，为金帛，为祖坟，为本党的“阶级利益”。当初，他是唱着“我们为博爱、平等、自由，不惜任何的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这首歌走向延安的，如此，这首歌又伴随着他，走过了人生最后的岁月。■

¹ 高尔泰：《谁令骑马客京华》，见《寻找家园》页360-362，北京十月文艺，2011。

²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页209，天地图书，1997。

³ 何方：《在日本研究所的三次讲话——日本研究战线上一个老兵的几点希望》（原载《日本学刊》2011年第3期）。《何方杂谈》页244，2012年自印。

【读何方的书】

何方的“世纪之问”

姜学斋

一、何方的提问

何方老在回顾往事的时候，不止一次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当年参加革命时怀抱的崇高理想就是为自由民主而奋斗，喊的口号中有“不自由，毋宁死！”唱的歌也是“我们为了博爱、平等、自由，不惜任何的代价，甚到我们的头颅。”可是后来不知怎么搞的，这个理想竟然渐渐地淡忘了。而且回头一想，反而越奋斗，离民主、自由、博爱、平等越远，甚至走到了它们的对立面。是当年选的理想错了（因为那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反动的），还是后来背叛了当年的理想（因为自由、民主、博爱、平等这些东西属于人类共同理想，不分什么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难道这些问题不值得认真反思？”¹

何方的问题，也是好多过来人的问题。李慎之在给何家栋的一封信中感叹：“五十年前，我是一个青年共产主义者，满腔热血，一片赤诚。五十年后居然走到了原初的对立面”。何先生在回信中说：“当初走进这个队伍，完全是看中那面民主自由的旗帜，现在也不能说是走到它的对立面，倒应该说是他们走到了咱们的对立面。”韦君宜的女儿告诉我们，她的母亲苦苦追求了一辈子，却在眼泪干涸的时候，才发现她牺牲了一切所追随的，都与自己年轻时的理想相悖。²冯友兰的女婿把他老泰山的一生归结为“早年实现自我，中间

¹ 《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前言。香港，明镜，2007。何方在《何方杂谈》中也多次提到这个问题。

² 杨团：《思痛录的成书始末》，《思痛录》页202。

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¹ 朱厚泽生前曾和几个八九十岁的老同志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怎么会从五四运动的德先生、赛先生（这些都是西方文明的表征），最后走上苏联的路？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从民主、自由、启蒙的房子里走进去，会从专制、独裁的房子里走出来？为什么一大批要民主，要自由，要个性解放的知识分子，最后却走到了专制独裁最黑暗的地方？”² 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困惑，胡绳《八十自寿铭》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粗知天命。”³ “两头真”的出现，正是为了排疑解惑的结果。当年抱着民主自由理想的民族精英，晚年再出发。这是一个长长的队伍，这里面有我们熟悉的名字：王若水、李普、何家栋、李洪林、李慎之、李锐、黎澍、吴象、冯兰瑞、刘宾雁……

杨继绳称“何方之问”为“世纪之问”，确是的论。

二、邓小平的回答

《历史决议》不承认走错了屋子，只承认走了弯路，只承认毛晚年犯了错误。而且这种承认有极大的保留，保留的办法很多，举其大者有三，一是舍车保帅——把毛的错误，推给林彪、“四人帮”；二是大错化小——把制度性的错误说成了认识上的错误；三是歪曲历史——把延安整风说成是思想解放。通过这些办法，得以坚持一党专政，维持个人崇拜，继续抗拒历史潮流。

有保留地承认错误，并不等于没有困惑。从1980到1991年，邓小平不下二十次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从建国到1978年30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

¹ 《何方杂谈》页407。

² 《朱厚泽文存》页472，390-391。

³ 《何方自述》页742。

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985年4月15日）可见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满脑袋问号的。

不过，他不说当初闹革命是为民主自由，只说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这是他的高明处，因为民主自由很具体，而这些主义很笼统。他更高明的地方是，“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984年6月30日）“不是完全清醒”，没有“搞清楚”，“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是快语——不下罪己诏的毛泽东，死抱着“帝国主义论”的陈云，都不会说这样的话。但是，快语也是托词——在关系到中华民族命运这么大的事情上不清醒意味着什么？在关系到几亿民众疾苦尊严这么大的事情上不成功说明了什么？邓小平顾左右而言它，轻轻滑过去了。

三、杨继绳的回答

杨继绳对“何方之问”做了宏大深奥而高远的解答：“人的创造性冲动常常与其魔鬼性相伴生。……精英们一直想方设法抑制人的魔鬼性，……然而，那些执行抑制人类魔鬼性的精英们，自己常常变成了更加可怕的魔鬼。……如何既抑制魔鬼性，又发挥其创造性，也是千古难题。”杨先生告诉我们，人类通过两个不同的路线来解决这个难题：

第一条，集体主义—行政整合—国有经济主导—计划经济—专制政治—封闭社会；

第二条，个人主义—契约整合—私有经济主导—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开放社会。

集体主义思想源远流长，专制制度源于人的动物性。从猴群、蜂群、蚁群的自相残杀中可见其之一斑。进化使人性增多，动物性减少。专制制度逐渐被民主制度取代。

个人主义在专制的压制下是微弱，潜伏的，不成体系的，但它不绝如缕。直到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出现以后才凸显出来。

早期资本主义带来了经济危机、社会危机、道德沦丧和战争，马克思主义代表第一条

路线，主张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全面的经济计划。虽然马克思也曾主张人道主义和个人自由。但是，一旦实行计划经济，他对人道和自由的承诺只能是画饼。他的经济思想否定了他的伦理思想。然而，由于历史、现实、传统、民族心理等多方面原因，中国人选择这个主义，这是历史的逻辑和必然。这样，王权专制的传统内核披上引进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堂而皇之登上了中国的政治殿堂。近百年来，前仆后继的革命志士，他们为民主、自由而浴血奋斗，造就的却是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的制度：苏联的专制和中国王权专制的叠加。于是，就出现了何方所说的：“越奋斗，离民主、自由、博爱、平等越远，甚至走到了它们的对立面。”

接下来，杨继绳比何方更进一步，把问题转移到中共领导层身上：为什么毛泽东一代党人，真诚地想救民于水火，最后却走向了专制？

杨的答案是：由于制度对创立者的限制（制度的结果不能预知，制度的创立受原有制度和外力的影响。制度一旦创立，就会反过来约束创立者，甚至迫使制度的执行者做出“不得不做的事情”。）所以，中国走了一个大弯路。这“不是何方这一代人不明智，也不是某几位主要领导人的过错，更不是某些人的阴谋，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站在历史大视野的高度看是弯路，身处当时的人觉得是光明的坦途。”“中国和世界一些国家都曾经走了弯路，这不能归罪于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甚至也不能归罪于某个政治集团。这是由多种因素的历史合力造成的。”

大概觉得把责任都推给了制度和历史有失公正，杨先生又补充说：“当事者本人并非没有一点责任，因为这毕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比较全面的认识，应该把两件事情分开：在道义上，他们是正义的，因为他们反对的是一个压迫性质的社会制度。但在发展方向的选择上，他们是错了。他们自以为为一个美好社会而奋斗，实际上他们建立的社会制度，比他们反对的更糟糕。”¹

¹ 此节所说的杨的言论出自于《炎黄春秋》2012年第4期。另见杨继绳《中国当代名人政要访谈述评集》，香港，天地图书，2013年。

这一补充，使杨先生陷入荒谬与悖论之中：难道“那些执行抑制人类魔鬼性的精英们，自己常常变成了更加可怕的魔鬼”，这也要归罪于历史合力吗？难道在发展方向上错了，也与某个人或某个政治集团无关，而应该归罪于历史逻辑吗？既然不能归罪于某个人和某个政治集团，那么，为什么当事者本人又要对错误道路的选择负责？

杨的答疑和解释，在把别人弄糊涂了的同时，也把自己绕了进去。幸好，杨先生还有自知之明：“何老的著作我没有读完。如果读完了，也许能找到“何方之问”的答案。”

四、何方的解答

何方的解答不高远，不深奥，不绕圈子，不避时忌。他认为，“一二九”的一代人之所以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就是因为“延安整风兴起的个人崇拜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实行的一元化领导和舆论一律。”也就是说，延安整风创立的专制主义，改变了革命奋斗的方向——“新中国虽然成立了，却并没有迎来自由民主，反而走上了专制主义的道路。”而他也因此“陷入个人迷信，糊涂几十年”。（何方自述下，页749）

李慎之在给何家栋的信中感叹：“五十年前，我是一个青年共产主义者，满腔热血，一片赤诚。五十年后居然走到了原初的对立面”。何先生在回信中说：“当初走进这个队伍，完全是看中那面民主自由的旗帜，现在也不能说是走到它的对立面，倒应该说是他们走到了咱们的对立面。”那么，中共为什么走上了“一二九”一代的对立面，成为一个专制主义的政党呢？何方从四个方面做了分析：

第一，马克思主义本身有问题。首先它的一些观点以至基本原理是错误的。其次，恩格斯对它有重大的修正和发展。最主要的修正是放弃暴力革命，而主张“通过普选和代议制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页754--755）

第二，中共曲解了马克思主义。毛、刘、周、邓、陈等中共核心层，“不但没有弄清楚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不少曲解、误解、片面化、极端化、僵化、教条

化。（页 751）

第三，中共奉行的是列宁斯大林主义。这个“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有些根本性的修正”，“这些修正有不少是错误的”（页 756）列宁的独特贡献并为斯大林所发扬光大的，一是建党学说，二是共产国际。前者把领袖专政合理化，后者把俄国“变成全世界的统治者。”列宁建党学说的特点是“一党专政、不讲民主、高度集权、绝对服从、铁的纪律、严格保密、依靠暴力、忽视人权等。”（页 778）。中共奉行的是列宁的建党学说（而且主要是其中“消极因素”），请核对原稿)并有所发展。

第四，中共继承了本国的专制主义和农民暴动的传统，接受了游民阶层的结党经验。“如神化领导、盲目服从、迷信武力、无法无天等等。”（页 780）“造成了实践中的专断、蛮干、胡来，严格的等级制度，以至大搞个人迷信等等。”（页 751）

何方没有把责任推给了人性、制度和历史，而是结结实实地指认了责任主体：毛对中华民族犯有重大的罪过，他“的路线使中国落后至少相当于一百年。”（页 814）毛泽东既有杨继绳所说的救国救民的真诚，也有秦始皇+斯大林的恶德和野心。而他的同事们——刘周陈邓等人，也是皇权主义的信奉者。“中国革命遭受挫折和走了弯路，特别是头二十八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败，这是一个重要原因。”（页 756）

五、结语

投奔中共的知识分子之误入歧途，与对中共的误读有关。误读源自中共的宣传——自三十年代初到四十年代末，中共就一直在宣传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毛甚至亲自出马，赞赏美国的制度。善良的人们没有想到，中共的上述作法是出于实用主义的生存策略——这是长期艰苦的环境培育的“红色基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无视诚信，没有底线。

误导是“红色文化”的属性之一，是“某个政治集团”的常规动作：30年代的救亡，50年代的“阳谋”，60年代的造反，70年代的批林批孔……其揆一也。■

【读何方的书】

史志直言昭万世

——何方老对中共党史的贡献

阎长贵



“史志直言昭万世”，这是我在何方老仙逝时所写挽联的上联。现在我还用这几个字作题目写一篇缅怀何老的祭文。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生于1905年，仙逝于2002年，享年97岁，早年曾留学苏联和参加长征，一直活跃于党的活动中，对党史非常熟悉，人称“活党史”、“活档案”。她说：“我们的党，历史搞颠倒了，好多东西要搞清历史事实，这就是拨乱反正。”（见何方著《党史真相》大山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2016，33页）何方老在晚年一直做这种“拨乱反正”的工作，在这方面，他的《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和《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两部著作，蜚声于学界和社会。他在党史拨乱反正中最出彩的事件之一，就是澄清和辨证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究竟选谁做党的领导人，即做党的“总书记”。这个问题，无疑是党史中的一个大问题 and 根本问题。

对这个问题我们党的文件和党史书是怎样说的呢？

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又说：“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还说：“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十分清楚，这个决议不仅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而且说

连遵义会议都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历史事实真是这样吗？不管怎么样，这已经成了我们党的定论。胡乔木 1951 年 6 月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以党史书的名义再次宣布：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1981 年 6 月 27 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经过 4000 多位高级干部和专家学者讨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郑重重申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仿佛已成为铁板上钉钉的事了，谁也动不得。谁若有疑问，谁就是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甚至极而言之上纲成“反党”。然而，在 20 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有权威的党史书（如《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毛泽东年谱 1893—1949》、《毛泽东传 1893—1949》）上，仍宣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不过有的书在“确立”前面添加上“实际上”或“事实上”三个字；——而这是为什么？

恕我直言，我认为，这表明所谓“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理不直气不壮。在 2013 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的日子里，又有人撰文专门论述“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的主要依据”，据说共有七条（从政治上看、从组织上看、从思想上看、从军事上看、从经验上看、从实质上看、从发展上看）——如果历史事实确实确实是“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地位”的话，并且已经过去快七十年了，再做这样的文章还有必要吗？我看这篇文章的发表（《光明日报》2013 年 10 月 9 日）至少说明一点，不论在党史学界，还是在社会上，这个问题都还没有取得完全的共识。

我们先看看毛泽东本人的态度和说法。

1964 年 6 月 16 日，毛泽东在关于军事工作落实与革命接班人的讲话中提到，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五朝领袖，第一朝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发，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即张闻天）。所谓领袖，亦即任总书记（或其他称谓；不管什么称谓，用现在通用的话说，这里说的领袖，就是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把手”）。据毛泽东的侄子、1975—1976 年任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2008 年亲口对我说，毛泽东在临终前遴选接班人时，他最属意和看重的是张春桥，但又觉得张春桥不能服众，于是经过翻来

覆去地思考，最终选择了华国锋；就是在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时，他还是想让张春桥做“军师”，即让张春桥辅佐华国锋。毛远新说，毛泽东曾让他向张春桥传达这样一句话：“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我不是就做了十年的副手嘛！”毛泽东说做副手，做谁的副手？显然是做张闻天的了。毛远新还特别向我说明，毛泽东1976年，说话，除了一些平常的生活用语，他的许多话，如一些地名、专有名词，谁都听不懂——张玉凤听不懂，我也听不懂，他说的“遵义会议”我怎么也听不懂，这几个字是他用笔写的。

众所周知，毛泽东并没有对从胡乔木最早说的遵义会议确立他的“中央领导地位”提出异议，换句话说，他是完全认可和欣然接受了的，但他为什么又不止一次地说第五任领袖是张闻天而他只是“副手”呢？其中有何玄机？我们再看看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说法。

周恩来，1967年7月12日，谈到毛泽东成为我们党的领袖前的五任领袖时，就说：“第五任是张闻天，他当了十年总书记。”（参见何方《党史笔记》。何方对“十年”解释：“这可能是个概数，即使算到1943年中央机构调整也只有8年。”）

在1979年8月25日举行的张闻天追悼会上，邓小平致悼辞，说张闻天“在这次会议（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

1985年4月13日，胡乔木约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人谈他回忆张闻天的文章时，说：（在遵义会议上）“……因为他（张闻天）起草了遵义会议的决议，而且推举他为总书记。”（见《胡乔木谈毛泽东与张闻天》，载2011年第8期《炎黄春秋》）——胡乔木这样说不直接违反和否认两个《历史决议》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顺便说一下，遵义会议上，大家都拥护和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而他本人并不愿意接任，致使有20多天党内无领袖，即无第一把手。最后，张闻天见实在推不掉才接任。当时毛泽东也是力主张闻天任总书记的。由于张闻天作风民主，后来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戏称张闻天为“开明君主”、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为“开明娘娘”。“七大”以后，毛泽东称刘英为“三朝元老”（参见王林育《张闻天与刘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哪“三朝”？显然是博古、张闻天和毛泽东。可见，从毛泽东自己的讲话中，他自始（他

成为党的领袖起）至终即到他逝世前，都没有否认过张闻天是一任（或：一代）领袖。

2013年，我写文章辨证这个问题。把拙文送何方老斧正。何老复我一封既热情洋溢又补我历史知识欠缺的信。兹公布何老的复信，以飨读者。

长贵同志：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有些地方还加上全军）的领导”，系延安整风时制造个人崇拜的产物，并不合乎历史事实。我以为，说成“遵义会议确立了以张闻天为首的领导集体”比较恰当。这也符合张闻天坚持了一生的反对个人说了算的领导体制和所有部门都适用集体领导的主张。

衡量党的领导人地位的上下、大小，恐怕应依据两个标准。一是所任职务的高低；二是领导工作特别是政治上所起作用的大小。以这两条标准衡量遵义会议及其以后很长一个时期（从实际上说到1938年六中全会；从名义上也就是完成正式的组织变动手续说，则为1943年3月中央进行正式改组，即解散原书记处，成立毛刘任三人书记处，刘提议主席有最后决定权的那次）的党中央第一把手，都只能说是张闻天，而不是毛泽东。

从组织上说，一是遵义会议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只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正式分工，张闻天主管全党事宜，毛泽东只管军事，还在周恩来之下（周以军委书记身份列为“三人军事小组”之首即组长，毛和王稼祥为组员）。二是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所有会议（政治局会议、常委会议、书记处会议、中央全会等）均由张闻天召开和主持，作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期间为了说服哥穆尔卡等同意提“以苏联为首”，曾解释所谓“为首”就是指召开会议。1938年六中全会上的报告和总结已改由毛泽东作，报告为《论新阶段》，公开发表。这标志着党的最高领导实际上已由毛担任，也就是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写的《反省笔记》中所说，此后即把中央会议移到毛泽东同志处举行，他只是在形式上当会议主席。三是出主意、用干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例如长征途中指派陈云、潘汉年离队秘密去上海，整顿中央在上海时期的组织及其同全国各地的联系；后转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请示汇报和重建一时中断的电讯联系。再如保持对全国各

地党组织特别是原中央苏区的领导和日常联系，包括派刘少奇去天津筹建北方局，处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办手续出国民党监狱等。

从政治领导上说，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到1938年的六中全会，中央会议的政治报告和结论都是张闻天作的，重要的如在遵义会议上作“反报告”和起草决议；一、四方面军会师会议的报告和决议；特别重要的是决定实行由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的瓦窑堡会议，报告和决议都由张闻天独立完成，因毛周正在前线指挥打直罗镇战役，张只能将起草好的报告和决议以及以苏维埃主席名义发表的告全国军民书，送到前线征求毛周意见。毛周彭（德怀）当即回信，表示完全同意，并请立即发表毛的告军民书。

因有别的急事，对此不能再多写。只简单答复一个从总书记变成“负总责”的问题。

建国后（可能是1955年，时间记不准确），苏联将共产国际（1943年即已宣布解散）所存有关中国的档案移交中共中央。当时没太注意，后来在整理中发现一份有“乙”无甲和丙的材料，即“乙，关于遵义会议”，没头没脑，不知究竟。各方询问，参加和知道当时情况的人都表示不明此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因为要作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又掀起研究党史高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询问陈云有关遵义会议的情况时，陈作了答复，并肯定那个“乙，遵义会议”的材料是他在会后向部队作的“传达提纲”。（对此，我不以为然。因为：1. 不像传达提纲，例如它违反遵义会议关于传达的决定，像不得点名等；2. 至今没有一个人说他听过这个传达；3. 既是“乙，遵义会议”，那么“甲”是什么？有无“丙”？）总之，这个“传达”无人知晓，毫无反应。因此，我看多半是张闻天派他去向国际汇报，他在路上准备的“汇报提纲”。正式党史以一个人的不知何用的资料决定遵义会议的来龙去脉，是不合适的。

很抱歉，这些天事多，无法详谈。以后有机会时再说。问好！

何方

2013年10月17日■

2017年10月于北京朝阳区和平里

【读何方的书】

我们如何成了暴力革命的信徒

——读何方《对时代的两种不同判断及其后果》有感

唐燕

何方老《对时代的两种不同判断及其后果》一文阐述了：二战结束以来，随着国际社会新秩序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许多国家都意识到世界已从“战争与革命”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并且按照这一时代特征制定了国策，从而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用改良的方式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实现了历史上空前的大发展。可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我们仍固守着战争与革命的理念，“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用各种政治运动代替经济建设，用闭关锁国取代对外交流，用“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代替搞缓和；甚至设想用“农村（亚非拉）包围城市（欧美苏）的持久战”消灭帝修反；更在中共九大报告中错误地定位为当时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由于对时代特征判断错误，我们和那些抓住机遇的国家背道而驰，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等各方面丧失了有利的发展机遇期。

何老的这篇文章引发了我对我们红卫兵知青一代是怎样成了暴力革命信徒的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正是由于对时代的误判被扭曲的。

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即效仿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统一的教育体制。1958年起始的教育大革命，又一改读经、国学、修身、人文、西学等等中华文化教育的传统内容，“把阶级斗争作为我们的主课”，使教育完全从属于政治，丧失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

阶级斗争理论无视生产要素的多元性和资本存在的合法性，无视只有当资本为劳动创

造了条件和机会时劳动才为资本的增值提供了可能，认定只有劳动者才创造了价值，而财富的拥有者和管理者只是无偿占有了社会财富。结果贫富成了评判善恶的标准，从根本上颠覆了人类几千年建立起来的善恶价值观。

阶级斗争理论无视每个代表社会不同利益的群体都有自由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权利，其矛盾只是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而非阶级矛盾，解决这些矛盾不应通过阶级斗争，而应靠制定相关的法律并严格遵守。

阶级斗争理论还无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信仰的自由，并享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基本人权，任何公民都既没有压迫他人的权力，也没有受压迫的理由。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却仍体制性、政策性地把国民分成三六九等，并煽动阶级仇恨，继续大搞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理论奉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也仍要使用暴力。结果把对“坏人坏事”施暴视为理所应当，不受良心和道德的谴责。

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教育和指导下，我们红卫兵知青一代从小就推崇革命，以革命为理想、为崇高、为人生目的；向往打仗、崇拜英雄，以没能生长在战争年代，没有当英雄的机遇而遗憾。我们把一切事物贴上阶级的标签，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分歧看作阶级斗争，我们相信“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根本没有仁爱、宽恕、妥协、合作等理念，只有对立、冲突、仇恨和斗争。结果我们失去了善良的本性，张扬了暴戾的人性，成了暴力革命的信徒。

我们不仅被告知：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且被教导：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了个社会主义的苏联，开启了社会主义的新纪元；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打出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必将打出一个在全球实现了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红彤彤的新世界。于是我们庆幸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更天天盼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打，以便加入解放全人类的英勇战斗，并随时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献身。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我们自己”，以及毛泽东的“

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成了我们的思维定式。

那时我们不可能认识到"战争与革命"不仅和人道、人权、人的生命这些崇高的观念相抵触，还同独断专行、无视法律、剥夺人民自由和私人空间的极权主义密切相关。更不懂得爱国主义可能成为专制的重要手段而值得警惕，因为专制下的爱国主义不仅夸大本民族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特殊性，仇外排外，还把统治者视为国家的化身和偶像。

在个人崇拜的迷醉中，我们相信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还存在着整个社会范围内的阶级对抗，所以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永远革命。

我们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敌视西方民主国家，对普世价值一无所知，以为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你死我活不可调和。我们不知道在那些不以阶级斗争理念和方式治理的国家，政治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高。

文革开始后，我们批判殴打代表资产阶级的校长和老师、斗争地富反坏右、抄家游街破四旧、砸烂封资修、打倒帝修反……文革这个"盛大的节日"给我们提供了当英雄的广阔舞台，终于为我们弥补了没有机会干革命的缺憾，也加剧了我们人性的恶变。

那时我们不仅在国内很风光很疯狂，而且大串联后在越南、缅甸等邻国也出现了我们的身影。我们豪情满怀，激情万丈，一心要投身世界革命，要把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插遍全球。

北京滑翔学校的赵建军和北航附中的李小倩等10名红卫兵从1966年9月起就开始学习越南语、到昆明湖训练游泳、……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后成功偷越中越边境，并于11月12日在越南入伍投入了援越战争。赵建军在给他爸爸妈妈的信中说："我不愿意在温暖的暖房里虚度年华，我的父母都是革命者，作为你们的后代，作为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我有责任而且也必须走你们走过的路，到部队去到战火中去，这样我在回顾往事的时候才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懊悔，放心吧，你们的儿子不会给你们丢脸的。"他24次请战要求到阵地最前沿，两个月后的1967年1月19日他被美国飞机投掷的炸弹击中，牺牲在自己的炮手

岗位上。

1967年1月23日北京和桂林的27名男女红卫兵秘密出了友谊关，后来被周恩来特批为抗美援朝的国际主义战士。

此外，1966到1968年间全国各地还有很多红卫兵或越境失败，或被在越南的我军劝送回国。

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我们许多人争先恐后要求去黑龙江和内蒙，因为那里离苏修最近，一旦打起仗来就是前线，"是英雄，是好汉，咱们战场上见！"

从1969年起，在云南下乡的昆明、北京、上海、四川等地的知青总共一万多人参加了1968年初刚刚崛起的，被中共暗地里支援的缅共人民军。在历次战斗中，知青们总是打头阵，当先锋。他们勇猛、忠诚、狂热，牺牲前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创造了一个个黄继光般的英雄传奇。数以千计的知青忠骨轻抛，其中许多人没有留下姓名。侥幸保存下来的遗体，被用绿色军用塑料布一裹，匆匆掩埋在异国的荒草丛中。

1969年夏天，北京101中66届高三老红卫兵臧平分创作的长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以佚名先在北京红卫兵中流传，后来迅速传遍全国。这首诗讴歌了红卫兵战士远征欧美亚非拉后，踏上归途前在异国的陵园向“最后消灭剥削制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英勇献身的战友告别时的壮烈情怀：

.....

还记得吗？

我们曾饮马顿河岸，

跨过乌克兰的草原，

翻过乌拉尔的峰巅，

将克里姆林官的红星再次点燃。

我们曾踏着公社的足迹，

穿过巴黎公社的街垒，
踏着国际歌的鼓点，
驰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
我们曾利用过耶路撒冷的哭墙，
把基督徒恶毒的子弹阻挡，
将红旗插在
苏伊士河畔。
瑞士的湖光，
比萨的塔尖，
也门的晚霞，
金边的佛殿。
富士山的樱花，
哈瓦那的烤烟，
西班牙的红酒，
黑非洲的清泉。
这一切啊，
都不曾使我们留恋！
因为我们有
钢枪在手 重任在肩！
.....
这是最后的斗争，
人类命运的决战
就在今天！
.....

毛泽东的教导，
伊里奇的遗言，
马克思的预见，
就在我们这一代实现！
.....

与这首充满浪漫主义激情的政治幻想诗相对照的，是北京四中 67 届高二学生张育海写给友人的，后经刘杰传抄，在各地知青中广为传阅的长信。

张育海 1968 年 10 月去云南下乡，1969 年 3 月加入缅共人民军。本来他被安排在营里当文书，但他坚决要求下连队当了机枪手。1969 年 6 月 21 日张育海战死在金三角。这封他在牺牲前 19 天写给友人的信道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浸润下，这位高才生对毛泽东的 "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 " 的丰富联想、以投身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壮怀心志、对战争残酷性危险性的 " 冷静的认识 "，以及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生命的坚强决心。信的后半部分如下：

历史的经验证明，我国现在的政治情况必然由不断国内革命变为不断的对外战争。当然，我们不是当年拿破仑，那属于法国大革命后不断的对外征服和侵略战争。我们进行的是完全不同阶级内容的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战争。你们在国内对 " 九大 " 一定了解很多，林总的政治报告不是再明白不过了吗？ " 九大 " 不过是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世界革命的一个总动员，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毛主席说 "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 " 指明这一点，在实际上，我国将要进行的这场空前席卷世界的斗争不会让哪一个地方，永远是一潭死水，一切人总要卷进去，而且持续两代三代也不一定。我觉得值得考虑的，不是没有机会投身历史浪潮，而是没有准备，缺乏锻炼，到时候被潮流

卷进去，身不由己，待浪潮过去，除了空虚、懊悔和似有所得的“教训”外，一无所得，似乎是评论拿破仑（也许是他自己说的话）“不是幸福特别照顾他，而是幸运抬头的时候，他有能力把握住幸运。”“如果能有“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思想，就会不怕环境的艰辛，而别人颓废的浪潮或许倒是件好事吧，试问，“当年主席上井冈山时，谁又想得到这里有着把握历史脉搏，决定世界命运的希望呢？

至于我走这条路，我是这样考虑的，确实我这条路是迷人的，马克思说过，让死人去痛哭和埋葬自己的尸体吧！那些首先朝气蓬勃，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在前途渺茫”、“走投无路”的下乡青年眼里，这更是一条无限灿烂的路。往往他们无力打破沉寂的生活压力，而企图做一次“最后的斗争”而博“一次”、“跳”一次，对学生来说，这可能是唯一的有希望的出路。在轰轰烈烈的战斗中，暗淡的灵魂重新爆发出灿烂的火花，不惧怕艰险而锻炼直上的“战士”。对于没有尝试过战争滋味的青年来说，我总有这样的想法，这不过是在一种逆流中的天真幼稚的精神安慰与宗教教义中的天国一样！

战争，不是想玩就玩儿的游戏，而是残酷的成千上万的人的惨剧。当然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来看这是天然的必然的，“暴力是新社会诞生的产婆”，和刮风下雨一样，不管你是否喜欢，而自然要来的，是人类解放必须的。当然不能像那些学生那样浪漫地去想，战争开始就要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而个人的价值，个人的意志，除战争的指挥者外是微不足道的，人只是在“哲学范畴”和兵力计较上有意义（我不是说人的因素，而是说人的价值），为战争整个的胜利，你可能就要做局部的支付而牺牲，尽管胜利是肯定的，甚至就在眼前，但你却看不见，像董存瑞就是突出的例子，而为了战争的胜利，守到一个人，没有什么援兵，肯定要守还是要守。明知要死，不顾牺牲，要冲上去的事是家常便饭，塔山阻击战呀，上甘岭战役呀，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缓冲阻击战呀，斯大林格勒战役等比比皆是，朝鲜战争初期之比是一：七，我伤之七，美伤之一（后期相等，后为七：一），有

时几个军被消灭的也有，而电影上的战斗，太浪漫主义了。这不是战争恐怖论，而是冷静的认识。为政治目标的实现，军事行动必做的牺牲。而学生中摩拳擦掌者是否准备无条件献身呢？也许有人想壮烈牺牲流芳后世，死也值得。一颗子弹来了，就人事不知，多利索，实际上大多数牺牲并不一定很壮烈，冷枪冷炮，或激战中冲上去就被打倒，甚至没有到位置，没有打枪，连敌人还没见到就完了也不少。打大仗的时候，有时一个班，一个排为通过封锁线而全部报销的也有，死也许不一定永远被人怀念，默默地躺在异国冷冰冰的地上，亲人还不知道。死也往往是受伤，因为后方医院来不及治，流血过多，经长期的痛苦和挣扎，头脑清醒地死去。古诗中“谁知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啰，“一将功成万骨枯”啰，惨凄悲戚之外，即在于此。学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后的学生，有很多抱负很大，看不清，在心里存有“在革命中成就自己”的想法。而当革命需要你牺牲时（不是我们平时写文章的高调），而是实在的献身怎么办呢？另外，军人的字典里没有“不”字，无论多危险，要冲就得冲，无论你怎么支持不住，要爬山要行军，天塌下来也得冲，你累？你病？你力不胜任？没有的事，干不了也得干。纪律要你这样，环境逼得你这样，否则战斗就要失败。在军队里，最好不要要求别人的同情、怜悯和谅解。另外，部队里也不见得没有矛盾，而且时时和死打交道的人当中，细致的感情是不多的，一切冲突没有缓冲而尖锐无情。总之，对战争来说，只有胜利，只有干到底，不论路多长。我现在停在战区的战场，横观世界，竖看历史，是最舒服的。战争发展起来，定是要艰苦的，关于卫国战争、抗日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你们也知道不少，那种时候，欲罢不能，有些人要停战了。在云南短短的战斗，对生活影响就极大，莫要说那么遥遥无期的战争了。

当然不是说刘杰就不行了，我有冠心病不是也干了。但有两点：一要珍惜和平的幸福，例如不至会饿饭，半夜不必起来站岗转移，不必倾盆大雨泥泞爬山路，不必雨中住山头。二不要以玫瑰色眼光看待战争，xx北京入伍，还没有到战斗单位就回去了，他以前的热情不亚于朋友中的任何一个人！除思想准备足，或天性如此的人外，适应战争的太不容易了！朋友中大概大伟（唐燕注：沈大伟，北京四中66届高三学生，1969年从他下乡的山西追

随张育海参加了缅共人民军，1970年5月24日在战斗中牺牲）、任杰最合适了，而xx就要深思熟虑了，不要匆匆下决心，一失足成千古恨，画虎不成反类犬。最后一次叮咛勿冒失，这儿走错了不比国内，我们的身份问题始终是悬而未定的，众说纷纭，这本来是件悄悄的事现在大张旗鼓，反叫中央为难，而且在一个时期内，不能公开承认。所以不要冒失！

当兵的和死打交道，不耐烦说话拐弯，信里写的不是打官腔，也不是吓唬人，只是希望大家保重，不轻易挺而走险。当然，战争生活是有其迷人的一面，不及多写信，请转看，我毫无顾虑！

问一切朋友好！

遥祝安康

育海 1969、6、2

1970年12月缅共人民军里的知青官兵们尴尬地发现，阵前的奈温政府已被中国接纳，中断了三年多的中缅外交关系有了恢复的迹象。

之后，那些陆续回国的知青们再次尴尬地发现，他们被要求：对自己这段为世界革命出生入死的光荣经历要“忍辱负重，不能说”。更有甚者，因为当年他们是自愿对外输出革命，按规定属于自动放弃中国国籍。丧失了国籍的他们由于在国内很难生存，有些只得再次返缅，重又参加了缅共人民军演变成的金三角地方武装，有的则靠在缅种罂粟为生。

直到1980年中国政府才出台了接纳他们回国的政策。然而，他们青春已逝，更错过了知青招工、招生、考大学等等的重大人生机会。

曾在缅共人民军身经百战，负伤四次的原昆明知青，现任缅甸掸邦第四特区土地局局长的谢斌回顾过去时说：“一个国家的革命应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靠革命输出是不可能成功的。作为我们来说，体会就深一点儿。”

如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解体，社会主义阵营也早已不复存在。数十年来，虽然美苏两国为争夺世界霸权纷争不断，但双方都只是通过局部代理战争、科技和军备竞

赛、太空竞赛、外交竞争等“冷”方式“相互遏制，不动武力”，直到冷战结束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没爆发，使全球经济、科技、文化得以大发展。

二战遗留的朝鲜和越南南北分治问题长期未得解决是美苏争霸的结果，刚刚成立的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却不仅没与苏、美拉开距离，还义不容辞地投入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结果白白牺牲了我们数十万解放军官兵，损耗了两千亿美元，损害了我们的国际形象，恶化了我国的周边局势，将我们置于美国和西方的对立面，更使我国失去了二战同盟国地位，没能享受二战的胜利果实，反遭数十年的封锁和禁运。

六十年多来正反两方面的事实教育了曾是暴力革命信徒、以解放全人类为神圣使命的我们：

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我们不应把各国对制度和道路的不同选择作为判别敌我的标准，更不应与之势不两立甚至诉诸战争；

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和惨痛的教训，尽力避免不计后果的世界大战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各国人民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追求和努力对霸权主义和世界大战已形成越来越大的遏制力量，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大发展正是得益于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也同样得益于我们终于认识到世界早已步入了“和平与发展时代”，并抓紧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

今后，我们应严格奉行普适价值这个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进一步融入文明世界，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和稳固，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互利互惠，共同发展。■

【读何方的书】

个人崇拜为什么长盛不衰

——何方《延安整风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读书笔记

续霜红

很多人谈个人崇拜，但是，在我的阅读经验中，何方谈得最深最透，也最有现实意义。在《党史笔记》中，他用了三章的篇幅，从基本概念入手，联系延安整风中的史实，讲述了毛泽东个人崇拜在延安的形成与发展，根源与条件，列举了文革后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十大表现，剖析了毛泽东个人崇拜仍旧长盛不衰的制度性原因。2005年，何方将这三章压缩整理成单篇论文，以《延安整风与个人崇拜》为题，在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总88期）上发表。此文在网上有载，但都有不同程度的删节。而且所有的刊载只到第四章，谈到文革后的个人崇拜的第五章找不到。在“全文连载”的博客上，这一章被屏蔽；下载此文的网页很多，但都徒有虚名。这一章只有在自印书《何方杂谈》中能够看到。

这篇小文拾遗补阙：一是简介第五章的内容；二是略加点评。

一、“长盛不衰”的两个原因

第五章的标题是“文革后毛泽东个人崇拜仍长盛不衰”。此章的开头，作者揭示了“长盛不衰”的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个人崇拜的社会政治基础依然存在”。作者指出：“斯大林去世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还在维护个人崇拜。当然，他们在斯大林被揭露后的一个时期，起初还犹豫了一阵并小有收敛，但很快就恢复原状，还痛恨起了反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赫鲁晓夫。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坚持实行的是从苏联搬来的一党专政下的整套专制主义体制。”说到中国，作者一针见血：“我们的政治体制依然如故，在有些环节上还有所强化。个人崇拜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纹丝未动，这是它能够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何方杂谈》355页）

第二个是个人崇拜“一直得到维护”，“没有得到认真清算”。作者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中共中央把它说成是反对“四人帮”，而“那时群众还不知道有个‘四人帮’，实际上是矛头直指文化大革命和它的总指挥毛泽东。”文革后的领导班子，“无论是原先在位的还是重新当权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坚持个人崇拜的。”正因为这种势力占主导地位，所以，反对专制（亦即个人崇拜）的运动“屡战屡败”，“直到镇压1989年天安门的‘反革命暴乱’，中国社会就进一步陷入近于万马齐喑和管制得越来越严的状态。”（358页）

另一个例子是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何方指出，十二大在这个问题上说一套做一套。会上宣布的党章说“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而大会报告上却把文革的罪责推到林彪、“四人帮”头上。“十二大后，维护和宣传个人崇拜反而比前一阵拨乱反正时期更加兴旺起来，党史上对毛泽东隐恶扬善、造神造假活动迄今未停止。而支持和进行这种活动的，正是党的前后领导人和掌管宣传及党史研究的部门。”（356页）

文革后，普遍存在着一个认识误区：既然十二大已经承认毛晚年犯了错误，那么，就没有了个人崇拜。何方打破了人们的迷思：十二大把毛的罪责转嫁给林彪、“四人帮”，这本身就是个人崇拜。《历史决议》否定了多数人对毛的批评，为此后的个人崇拜提供了依据。而这一切的根子，就在一党专政。

二、文革后的个人崇拜种种

接下来，作者在“文革后个人崇拜的主要表现”的题目下，列举了“维护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十种做法”：

一是加强对毛泽东的持续宣传和歌颂。最明显的例子是，凡是文革中因为对毛提了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文革后为其平反，不能说当事人对毛的意见提得对，而是“首先为

他摘掉反对毛主席的帽子。”“我自己受命为张闻天起草有关平反文件和为人代笔或自撰纪念文章，都是要一再说明张闻天是衷心拥护而不是反对毛泽东的。”（页 360）

二是为尊者讳、隐恶扬善、移花接木、改写历史。作者举例：《毛泽东文集》八卷，1959年以前是两三年就编一本，1959年起的16年才编了一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共13卷，1966年以前都是一年或两年编一本，而68年以后竟长达8年才编一本。“这显然是因为后来的许多言论实在不便公开，因此就不顾历史真实而为尊者‘讳’掉了。”“官方党史著作和传记年谱还有意隐瞒许多重要史实，如准备主动分裂国共合作抗日的所谓十五万精兵计划，毛泽东向斯大林的一些重要请示汇报，1943年底季米特洛夫致毛的一封关系重大的密信等。”（页 361）移花接木“就是党的领导和党史界把别人的功绩放到毛泽东的名下，把毛泽东的过错放到别的人箩筐里。例如在纪念刘少奇百年诞辰时，代表中共中央的讲话中，一开头就说刘少奇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创建了十多个根据地，周恩来等人的军事建树，都一律挂到了毛泽东的账上。”（页 362）

三是对毛泽东继续进行美化与拔高。文革后，党史研究率领官家回忆录和红色文艺这两支大军，专门为毛涂脂抹粉和歌功颂德。“许多更重要的不合乎实际的说法竟被定为正式结论。如说，延安整风中康生掀起抢救运动，为毛泽东和党中央及时发现和纠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出于为党为人民而防修反修，只是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不提毛怎么重用提拔保护江青，只强调毛对江的批评。“最后改编只剩下七百余人的秋收起义，被肯定为胜利；而开往井冈山时还有一万二千人（其中二千主力，一万农军）的南昌起义，却被说成失败。”（页 362-363）

四是对推行个人崇拜的放行、奖励，对不利于个人崇拜的查禁、处罚。“二十多年来，有许多美化和拔高领袖、宣传个人崇拜的作品得到了各种表彰奖励。而揭露真相、涉足禁区、有碍个人崇拜的作品，轻则查禁，重则处罚（作者被列入不得在报上发表文章的‘黑名单’或找别的理由加以处罚；编辑出版部门有关人员可能受到批评、警告、调离，甚至

判刑处分)。”“连《潘汉年》的电视剧也历经磨难,最后还被砍掉不少。¹有些作品还长期被扣押,包括一些著名人物的回忆录以及拍好的却遭禁映的有关名人的电视剧等。因反映实际,被认为不利于个人崇拜(直接或间接有损于毛泽东形象)的作品遭到扼杀、枪毙和胎死腹中的数量之多,恐怕是无人能统计出来的。在这种舆论导向和环境所迫下,人们就自觉(可以名利双收)或不自觉(认为应该如此)地竞相创作起个人崇拜的东西来了。这就是不实事求是的论著和作品那么多,还越来越多的原因。”(页363-364)

五是为维护个人崇拜(毛的威信)使历史上不少冤案至今得不到平反。作者举了几个例子:肃清AB团“错杀了十万左右对革命忠心耿耿的优秀儿女(有名有姓的‘AB团’七万多,外加‘改组’两万多,‘社民党’六千二百多,²还有许多未查出名姓的冤死者未包括在内),而毛泽东却始终认为杀得对。³”“直到现在仍未得到正式平反,有些冤死者家属曾一直被当作反革命家属,拨乱反正后也享受不到烈士家属待遇。”

又如西路军遭歼与毛的关系甚大,而毛却把它说成是“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这一重大冤案和根本违背事实的结论持续了四十五年,许多当事人如一直强调‘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的陈云以及徐向前、李先念等始终都不敢提。”“为了维护个人崇拜,不知有多少革命者冤沉海底!”

六是不敢正视历史错误,不愿意接受经验教训。毛在1949年之后,“执行了一套‘左’倾错误路线,而且愈陷愈深,使中国走了一大段弯路。但为了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隐匿大家紧跟的责任,硬是要歪曲历史,造成不少自相矛盾,即许多原来的错误,拨乱反正后已经改了,但还要说原来正确。”《历史决议》说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

¹ 作者原注:据该剧发起人曾彦修和潘多年的熟人刘英讲,由于个人崇拜思想的影响,或为求得送审时通过,已经删改了大量史实,如潘的冤案形成,毛泽东不按法律程序的定性、逮捕和关押等。还对二十年的迫害、无端的牵连等,也有意回避掉了,并多少编造了一些不大合乎事实的情节(如潘回延安请示汇报是向张闻天被改为毛泽东),弄得本来就不够真实,但后面几集还是被完全删去了。

² 作者原注:景玉川:《富田事变平反的前前后后》,《百年潮》2000年第一期。文中说的富田事变得平反是没有根据的,只能说酝酿平反和在党史研究中得到平反。文中所说“对富田事变的定性和红二十军的处置后,‘左’倾领导者”如何如何,显系为毛泽东开脱。实际上毛是屠杀“AB团”的始作俑者(起于1930年5月,而“左”倾中央上台于1931年1月)和富田事变的制造者。

³ 作者原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51年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释34(第242页)。另见正文第210、217、218页。

“完全正确”；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农业手工业合作化“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何方质问：“既然如此，那为什么现在又要走回头路，改变‘完全正确’的东西？”（页 365）

七是保留个人崇拜的文物和遗迹。何方以毛纪念堂为例，邓小平明明说“建是不妥当的”，为什么知过不改？说是怕“人民就要议论纷纷”，其实只能是少数领导人的议论。斯大林像从天安门广场搬走，就不怕人们议论纷纷？看来还是要尽可能坚持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大约出于同一原因，各地的毛泽东纪念馆和故居还在不断扩大和修饰。”（页 366）

八是放纵和误导毛的个人崇拜的某些回潮。“例如产生于 1986 年前后的一种被称为‘寻找毛泽东’的社会现象。¹”当局“误以为这是人们希望恢复毛泽东体制的表现，因而乘机大反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至于工农群众用神化和迷信的方式怀念毛，何方认为，“这既反映了群众的怀旧感情，也是一种愚昧的表现，更重要的是说明个人崇拜的阴影还严重存在。我们的宣传部门虽然遵奉无神论和科学观，但因这些社会现象涉及的是毛泽东，自然不容讨论和解释，客观上是对个人崇拜的鼓励。”（页 367）

九是继续保持和增设有利于维护个人崇拜的禁区。典型的表现就是“不准批评领袖”，“这一不许批评领袖的个人崇拜标志还传下来，即后来的领袖更不容许批评。”邓小平说对他能作“六四开”，他就满意了。还说周恩来做过违心的事，说过违心的话。“那为什么对这‘四成’错误就不能进行讨论和分析呢？”为什么对周恩来的违心之举不能做分析，弄清楚哪些是真违心，哪些不是？（页 368）

十是把有助于个人崇拜的规定写进党章、宪法及其他法定文件，只让党员和公民学习与遵守，不得讨论和提不同意见。“不允许讨论党章、宪法、某些文件以至‘重要讲话’，这是既不合理（马克思主义和普遍的民主原则），又不合法（剥夺党员和公民应有权利），因而不应列为禁区。”（页 368）

以前，我知道好多平反的案例，但从来没有深究平反的理由。何方的剖析让我眼前一

¹ 作者原注：以一批青年作者撰写的《寻找毛泽东》一书（吴方泽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为代表，再加上一时盛行的吟唱老的革命歌曲和群众中对毛泽东时代的某些怀念，曾被一些“左”派人士和宣传部门喻为“毛泽东热”。

亮。AB团的乱杀，西路军的惨败，我也多有所闻，但是从来没有与个人崇拜联系起来。《历史决议》所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等结论，三十多年来一直为学界所遵循，鲜见有谁像何方一样，指出它的虚伪和矛盾。何方的敏锐和渊博，他对社会现象的观察之细，对中共党史的钻研之深，令人折服。

三、维护个人崇拜的三大理由

个人崇拜祸国殃民，人所共知。要继续搞个人崇拜，就得找出理由。何方为我们归纳出邓小平制造的三大理由，并一一予以驳斥。

一曰毛“功大于过”。邓小平要求《历史决议》“集中讲正确的东西”，而“建国后的总路线和许多重大事件都是事实证明根本错误的”“功过三七开或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量化或形象化说法，其实在多数场合下只是为掩盖错误和罪责的一种遁词。”（《何方杂谈》页374-375）

二曰“否定毛即否定党”。在邓小平的逻辑中，否定毛就是否定党的历史，就是给党国抹黑。（见《邓选》二册页301-302、306、308）何方指出“这种说法正好把毛泽东摆到了‘朕即国家’的地位上。不然为什么否定一个人就是否定历史，就是给党和国家抹黑？难道一个人就等于历史、等于党和国家？秦始皇被批判（否定）了两千多年，不但秦汉历史没有被否定，中国也没有从此变‘黑’。”“提出‘否定’‘抹黑’这样的大帽子，实际上就是使人们不敢离开规定好的统一口径，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评论。”（页375）

三曰“稳定压倒一切”。其实这是保护毛过关的借口。事实上，中共中央已经否定了毛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毛建国后推行的路线。结果反而是“摆脱了文革造成的混乱和内战，实现了政局的稳定和人民的大团结。”“允许研究和评估包括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等在内的历史问题，是否就会破坏稳定，影响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的大局。从中外历史和长期效应看，情况倒是往往相反。”（页376）

四、维护个人崇拜的五大原因

何方指出，上述三大理由都是遮眼法。维护对毛的个人崇拜的真正原因有五：第一为了维护毛时代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第二为了维护干部集团的利益。第三个人崇拜是一党专制的一部分；第四邓小平、陈云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第五维持政权的正统和体制合法性需要个人崇拜。在这五大原因中，最值得一说的是二和四。

邓小平说过：“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邓选》二卷，页298）。这话是他1980年说的。三十年间，人们引用了无数次，没有人提出异议，只有何方看出了问题：“说老工人通不过，有何根据？那是否说新工人就可通过？”他算了一笔账：毛时代垂三十年，除了土改那几年，剩下的二十几年间农民一直吃苦受穷，甚至全家饿死。你邓小平仅以土改为标准，说得过去吗？接着，他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贫下中农对毛的态度。安徽六安苏家埠的贫下中农党员悄悄问他：“毛主席为什么这样心狠，就是不让我们吃饱饭？”他得出结论：“连新老工人、新老农民的真实情况和意见的反映都遭到查禁，可见说他们‘通不过’只是想当然而已。”事实上，邓小平所说通不过的，是“一大批干部”。这些人“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者的特权群体，他们反对民主改革，反对‘自由化’，维护毛泽东时代的体制和思想，应当看作是自然的事情。……他们反对政治改革，但一般还支持经济改革，使权力进入市场，可让家属接班或下海，所以他们及其代表，维护个人崇拜的专制体制是必然的。”（页378-379）

尽管邓小平、陈云批评毛犯了错误，但他们与毛同属一个集团，休戚与共，荣枯一体。深究毛的罪错，势必会联系到他们。毛晚年怕出赫鲁晓夫，邓、陈同样关心历史的评价。“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实际上也就是保护自己。”陈云说得坦率：“否定了毛泽东，也会连我们这些人都给否定。”所以，陈云不顾老红卫兵血债累累，拼老命也要保这些“红

二代”接班，就是怕死后被人“挖祖坟”。

五、破除个人崇拜的根本途径

严家祺在《首脑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中说：“个人崇拜是专制政治中会反复出现的现象”。“如果以‘崇拜度’为‘纵轴’，以‘时间’为‘横轴’，那么，个人崇拜曲线就是一条‘钟形曲线’。毛泽东个人崇拜，九大达到高峰，两年後因9·13事件，迅速下滑。1982年，《中国共产党章程》明文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这时，这条‘钟形曲线’下降到最底点。”

严家祺前面一句说对了，后面的话说对了一半。何方告诉人们，这个最底点不过是舍车保帅的表面文章，承认毛有错误，以及党章的规定不过是遮人耳目的把戏，事实上，个人崇拜的“钟形曲线”不但继续攀升，而且发生了位移。一元化的人治是个人崇拜的基础，只有实行民主和法治，才能从根本上破除个人崇拜。■

【读何方的书】

毛泽东的误判与反日愤青的出炉

——读何方“国际形势与外交问题”有感¹

司 绛

一、“反日游行”打砸抢

2012年9月，西安、广州、北京等多座城市，暴发“反日游行”。“爱国青年”成群结队涌向街道、商店，烧日货，砸日车，西安日系车主李建利的颅骨被砸了一个大洞，成了瘫痪，凶手蔡洋直到被捕，还认为自己是在爱国。

¹ “国际关系与外交问题”是《何方杂谈》一书的第一部分内容的总标题。此书是自印书，印制时间大约在2012年。

这个波及全国的反日活动，端赖于大陆媒体对钓鱼岛的宣传。近些年，民族主义行情爆涨，根本原因就是上面的鼓吹。

二、“战争与革命”：毛泽东的误判

民族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排外仇外，而事情一旦与日本有关，则会激起国人的“受害意识”，演变成对使用日货的同胞的打砸抢。各国都有民族主义，而中国的表现最极端，根子在哪儿？何方告诉我们，根子不在下层，在上层；不在群众，在执政党。是毛泽东错误地判断了二战后的国际形势，无视世界已经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新阶段，死抱着“战争与革命”的陈腐理念，以左反左，一错再错。

毛的误判，来自列宁——既然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那么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把它送进坟墓。毛的“斗争哲学”给这种误判带上了中国特色。作为列宁主义信奉者，毛的追随者，毛的同事们在这方面出奇的一致。“1965年9月29日，陈毅外长用毛泽东内部报告中的语言，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奉命叫板：“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英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¹ 那时候，整个上层“神经紧张的不得了”（何方）²，把大部分心思都放在备战备荒，准备打仗上面：搞大小三线，把沿海的工厂搬到内地的山里；“深挖洞、广积粮”，全国到处挖防空洞；抗美援朝，输出革命……。“直到设想用‘农村（亚非拉）包围城市（欧美苏）’和持久战的办法，一举消灭‘帝修反’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³ 战争随时降临的“焦虑”使中共中央患上了集体“躁狂症”，从防备入侵发展到盼望战争，“一天诚惶诚恐”（邓小平），⁴逆历史潮流而动。“人家着眼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我们重视继续革命，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和发动整人运动。人家千方百计开展对外交流，取长补短；我们为反对‘西化’和防止和平演变，坚持闭关自守。人家要

¹ 何方：《建国前期外交的反思》，载《何方杂谈》自印书，页20。

² 同上，页20。

³ 同上，页21。

⁴ 邓小平的原话是：“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见《邓小平思想年谱》页302，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搞缓和，我们强调战备。”¹

这种误判带给了中国什么呢？“人家迅速发展，进入新的文明阶段；我们落后倒退，丧失了一次最有利的发展机遇期。时间虽然只有三十年，但要弥补起来”，即使“‘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邓小平，都说到国庆一百周年时才能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²

三、愤青是怎样炼成的？

上层的集体躁狂，通过会议、媒体、课堂传染给广大国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陆青年不分男女都盼着打仗，红卫兵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讴歌，知青越境到越南抗美，洒血异域……。从观念和心理上讲，这些人就是当年的愤青，就是现在的蔡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不但自主生产出数不清的“高大全”，还负责炒作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日愤青。

什么是炒作？炒作就是为扩大大人或事物的影响而通过媒体做反复的宣传。何方举了两个最适合炒作的例子。一是日本的教科书，二是靖国神社。“国内大量宣传日本的教科书否认历史，实际上，日本的教科书是下面自主采用的。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为侵略破坏狡辩的中小学课本被学校采用的不到1%。……我们把教科书这类问题炒起来，给中国人造成日本不承认侵略的印象。”³同样，靖国神社也是中国自己炒起来的。“原来中国老百姓不知道有个靖国神社，现在就都知道了。”“我们当然反对日本官方要员参拜有甲级战犯在内的靖国神社。但是我们也不应让一个小泉来主导中日关系。⁴同时我们也可多介绍有关日本神道教、靖国神社、遗族会等的情况及其在日本选举中的影响，以增进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⁵

按照“炒作学”原理，这两件事都是“火辣辣的”的题材，符合“能直接挑破观众的眼球，使观众如斗牛场的斗牛一样，眼前一片血红，置身于迷乱云雾中”的题材要求。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中国媒体的反复宣传之下，反日愤青新鲜出炉。

“每一个国家都有愤青。德国有新纳粹，俄罗斯的光头党……有极端分子是社会普遍

¹ 何方：《建国前期外交的反思》，载《何方杂谈》自印书，页21。

² 同上。

³ 同上，236页。

⁴ 小泉纯一郎，2001--2006年间任日本首相，2006年8月15日，小泉不顾中、韩两方反对，在日本时间早上7时40分（北京时间2006年8月15日早6时40分）前往东京靖国神社参拜。

⁵ 何方：《突皮中日僵局》，出处同上，页228。

现象，关键是如何引导，引导不好的话愤青会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现在的愤青在相当程度上是我们制造的，因为我们老算日本侵略的历史账。演的电影、电视，日本侵略占的分量很大，把日本人写得很坏，而我们自己的历史教训却不让讲。大跃进不准写、文化大革命不准写、反右派不准写。自己的经验教训不能接受，只在别人身上找经验教训，就可能培养出一些愤青。”¹

在这里，何方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老算日本侵略的旧账，不利于中国的发展。“我认为提出算账本身就是错的，你算账要算到什么时候？叫日本人怎么解决？给你磕头还是赔款？赔款我们不要，磕头有什么意思？所以老提历史问题的做法本身就有问题，而且没法解决。”² 中国老嚷嚷叫日本道歉，而日本人已经道歉过了，人家不知道道歉到什么程度才能达到中国的标准。³ 结果适得其反，原来有的歉意，也没了。



于是，蔡洋们愈加愤怒：“十亿青年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宁肯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他们拉着辱骂日本的标语，高喊着“日你先人板板”的口号，抡起U型车锁，砸向同胞的脑袋，冲进“浪琴”表店，不易砸碎的手表遭哄抢，一边大骂“卖国贼”，一边剥光大学男生，只因为他穿了日本品牌川久保玲的外套。

其实，何方也并不孤单，自有明白人做他的拥趸：“之所以现在国内如此强烈的仇杀情绪，我认为大概是ZF为了转移视线，另有用途吧！日本的先进是无可质疑的，无论从文化科技教育各个方面它都是中国的老师，如果国人还有点自知之明，如果中国真的想复兴，就必须虚心且有诚意的向东方这个小个子老师认真学习。”⁴

网民如是说。■

¹ 何方：《谈中日关系60年》，《何方杂谈》页241。

² 何方：《谈中日关系60年》，《何方杂谈》页240。

³ 同注1，页238。

⁴ 中国的仇日情绪都是政府炒作的，https://tieba.baidu.com/p/2591296138?red_tag=0687459291

【读何方的书】

也谈“何方之问”

——《何方自述》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石名岗

何方老从1938年参加革命，到2005年左右《党史笔记》、《从延安一路走来》等著作的出版，经历了七十年的时间。七十年的坎坷经历，七十年的求道之路，必定使何方老悟出了很多东西，致使他发出了何方之问：“当年参加革命时怀抱的崇高理想就是为自由民主而奋斗，喊的口号中有‘不自由，毋宁死！’唱的歌也是‘我们为了博爱、平等、自由，不惜任何的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可是后来不知怎么搞的，这个理想竟然渐渐地淡忘了。而且回头一想，反而越奋斗，离民主、自由、博爱、平等越远，甚至走到了它们的对立面。是当年选的理想错了（因为那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反动的），还是后来背叛了当年的理想（因为自由、民主、博爱、平等这些东西属于人类共同理想，不分什么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难道这些问题不值得认真反思？”

其实，何方老岂止问的是延安过来的路，也是问的国际共运之路，世界革命之路。在此谈一下“何方之问”给我们的启示。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弄清马列毛的区别。

一、马克思的“初心”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的欧洲还处在资本主义发端的时期，阶级斗争特别激烈，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条件。当时社会主义和革命的学说很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抢的“头筹”，当然是因为它“科学”地论述了社会主义。

按马克思的经典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在于它的两个条件，一是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二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强大。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到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实际上马克思是承认了资本主义的合理性，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在社会发展中需要资本主义激发生产力的活性，用先进的生产力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换一种说法就是马克思不认为社会主义能够大大地促进生产力，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创造巨大的财富，要不然马克思绝不会对社会主义设置这样高的门槛。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不但为社会主义打造了物质基础，而且打造了创造社会主义的人即强大的现代无产阶级。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称作为“资产阶级掘墓人”。但是强大的无产阶级是伴随着强大的资产阶级成长的，所以，这就需要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

简言之，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论。也是《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30岁）、恩格斯（28岁）年轻时（1848年）的作品，是密谋性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宣言，体现了马、恩年轻时的激进思想，即鼓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思想，无疑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

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有了新的体会，他在《资本论初版序言》中说到：“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马克思这段话的意思有：

第一社会发展阶段不能跳跃；第二能减轻新社会分娩时的痛苦（可以理解为不用暴力的自然发展）；第三不要资本家个人对其生产关系负责，即落后的生产关系不是个人的责

任。

很显然《资本论初版序言》的观点比四十年代的《共产党宣言》，在历史唯物论的认识上，显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以至于马克思提出了“德法英三国同时爆发革命，革命才能成功”的论点。后来马恩致力于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发展，体现了以和平的合法的工人运动替代布朗基主义的思想。

很显然，马克思主义也经历了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历史唯物论也得到了完善。

马克思主义体系本身，尤其是其前期与后期存在着矛盾，即自然发展与人为提倡革命的矛盾。可以说马克思的早期并不是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马恩的晚年越来越接近马克思主义，并力图弥补这个矛盾，但始终无法圆满。这个矛盾使马克思主义在后来分裂成为考茨基派和列宁派。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缺陷在于只强调阶级斗争，未强调阶级合作，其实社会主义只有阶级合作才能实现，如北欧的社会主义，所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二个条件实际上是不充分的。

总之，历史唯物论有着很大的合理部分，至于后来被僵化为“决定论”，那是另一回事了。

二、列宁的“变通”

二十世纪初的俄国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落后的俄国却有着由“先进理论”（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政党——社会民主工党，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或悖论：要么实行资产阶级革命，变为资本主义；要么修改科学社会主义的条件，按历史唯心论，进行非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试验”。

列宁的，或者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的选择是第二条道路，为此，列宁与名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学派考茨基派进行国际共运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论战，即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学派与“跳跃”学派的论战。这期间，列宁间接批驳了马克思“在德法

英三国同时爆发革命，社会主义才能成功”的理论，创建了“一国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论，后来发展成了“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1916年，列宁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把正发展的美英德法日等资本主义判断为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并把俄国也列入帝国主义行列。

列宁有了严重的误判，二十世纪初的帝国主义行为并非资本主义已经垂死，而是利用这种行为进行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从而完成更大规模的原始积累。另外落后的俄国连工业革命也没有完成，村社制度是农业的主题，怎么说也不是资本主义，更遑论最高阶段了。

历史进到了这个当口上，给落后国家的号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出了难题。列宁说过一句著名的话：“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他的敌人不得不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这句话也反映了列宁的复杂心情。

列宁感觉到仅靠俄国少量的工人的力量远远不够，就提出了“工农联盟”的概念。在马克思学说的经典概念里，农民不是一种“革命”的力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后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是这样评价农民的：“中间等级……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但是，没有资本主义，农民怎样能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所以在俄国革命中，无产阶级是从左的方面反对资产阶级，而农民阶级是从右的方面反对资产阶级。

由此，俄国革命的工业国有化运动，是工人阶级的要求，它的运行结果是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农业的集体化运动是农民阶级的回到封建村社状态的要求，是工人阶级对农民阶级的让步，它的运行结果是集体农庄制度。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共《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激烈地批判了苏联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说明苏联的社会主义不是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说明了苏联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也证明了历史唯物论的正确。七十多年，俄国完成了一个转变，从土地

封建到资本封建的转变，这是俄国革命的结果，也许这也是一种社会进步。俄国布尔什维克自以为播下的“龙种”，收获的却是“权贵资本主义的跳蚤”。

三、文革及回归

在中国革命走向“农村包围城市”之时，就注定了这场革命是农民为主的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无疑是最适合中国实情的战略思想，如果从胜负的角度来讲，它超过了诸葛亮的“隆中对”。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因此它的内容必定是土地问题，因此中国革命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搭界，但是它与农业社会主义及公民的公社理想却紧密相连。

“山沟里马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距很远，与列宁主义有一定关联，但它距离农民比列宁主义更近。从当时的状况看，土地革命即“耕者有其田”无疑是一种进步，它是迈向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初的一步，当然以后还有漫长的道路来完成整个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故而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口号，这是相对正确的一个口号。

曾几何时，新民主主义成了一瞬间的事，人民公社运动成为跑步进入空想共产主义的桥梁，这显然是要用法令取消社会自然的发展阶段，结果造成了一场大灾难。为了渡过这场灾难，只好拾起了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武器。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党内和国际共运也因为所谓路线问题产生了激烈争论和论战，最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在后来人的眼睛里，文革就是一群红卫兵的瞎胡闹，这当然是非常片面的，因为文革初期红卫兵瞎胡闹的对象并不是走资派。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布文革对象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明了文革是农业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大扫荡，是党内极左派对“走资派”的最后的斗争，也是极左派最后一次力图实现公社理想。固然

文革有反腐（腐败是封建专制和集权的产物）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反修防修（即反资本主义）。

文革的过程，充满了两条路线的斗争。走资派对文革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其中主要有实行“资反路线”转移斗争目标、“二月逆流”、“二月镇反”、“军内走资派”对造反派的镇压、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直至发动“四五”群众运动。过程中，走资派由大多数人反对，到大多数人拥护，说明群众在文革中认识到了极左的危害，改革开放的必要。山西文革中“张赵反革命集团”的纲领《论现状》就证明了这一点。

文革后的改革开放，正是对文革反思的结果。文革中出现的“补课”理论（即中国需要补资本主义的课）和之后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的说法成为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三自一包”和市场经济的回归，使中国出现了类似于新民主主义的局面。中国的经济在三十年内有了飞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验证了历史唯物论的正确合理的一面。

四、试答“何方之问”

与封建为基础、集权了几百年的西欧相比，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集权了几千年的国度，要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要走更长更曲折的路。就像当年落后的俄国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一样，二十世纪的中国显然不具备普世的条件。

在老百姓还在为衣食住行而努力的时候，民主只是知识阶层的要求。当中产阶级占社会大多数的时候，社会才有可能具有长期稳定的民主，即不发生暴力革命环境，这是民主的物质条件。以《人权宣言》为标志的法国大革命一百多年后，才真正确立民主人权就是最好的例子。

民主的另一个条件是全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低水平素质的民众只能产生义和团、冲锋队等愤青。这是民主的精神条件。如果这个条件不具备，民主有

可能返回专制。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由民主产生法西斯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民主总是先从上层酝酿，只有上层充分认识到民主对他们的好处(即政治活动安全性)，民主才能逐步实现。

为了使大清朝不至于灭亡，1906年慈禧太后曾经下诏准备立宪，她设置了九年时间，人们觉得时间长了，但还没有动作，慈禧太后就走了，立宪之事不了了之。

无独有偶，过了几年孙中山先生设定了立宪三部曲：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到宪政也是九年，似乎也是不了了之。

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宪政还在“何方之问”的阶段，这说明实行它的条件还真的不成熟。试想：民选村主任的活动都搞得一塌糊涂，假选贿选比比皆是，况乡、县、省、国乎？

对于民主不能向列宁一样犯急性病，所有的条件应该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这个“自然”当然包括人的活动，不过这种活动不仅仅是对集权的谴责，甚至不主要是谴责，即不要对手逼向绝路。民主之路也是各阶级合作的产物，这就是对“何方之问”试回答。■

【读何方的书】

延安整风的文化遗产

——何方谈造假与违心

穆德冰

读何方的书，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造假的揭露、批评和痛心疾首。我这里所做，只是把何方的这些文字做一归纳整理，使之条理化，并适当加上我想到的一些例子。同时，讲一讲我从中得到的启发和由此产生的想法。

一、造假八大案例

何方的书中，谈到了很多造假的人和事。按照先上后下的顺序，我归纳出了八个案例。

1) 中央带头造假

何方告诉我们：“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党带头说假话（反右派的‘钓鱼’，大跃进的‘放卫星’等等），于是说假话很快普及到全社会。”（《何方自述》页791，下同）

何方就《历史决议》中对毛的评价，举了几个不为人注意的例子——

例一，《历史决议》说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三大特点或者叫活的灵魂。事实上，前两个完全是纸上文章，根本没有实行过。何方发问：“从建国后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到文化大革命，以及这中间不断的各种运动，又有哪些和在多大程度上是实事求是的呢？由此可见，把实事求是列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特点，这本身就不够实事求是。”“毛主席提出实事求是之日，也正是在内部大规模实践不实事求是之时。这个词汇的新解（《改造我们的学习》）发表于延安整风开始的一九四二年三月。四月，毛泽东就提出了审干和肃反，紧接着就是批判王实味和普遍开展审干和抢救运动。在一个短时期内，把多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打成特务，这能算实事求是吗？”

至于把群众路线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何方一针见血：“这在三年困难时期已经完全变成了讥刺。而且追溯到以前，不但大跃进、公社化、反右倾、刮共产风绝对不是走群众路线，就是反右派、反胡风，以至三大改造，都谈不上走群众路线。”

独立自主倒是认真实行了一个时期，“不仅同苏联破裂，而且近乎全面出击，同帝修反斗，支援世界革命。结果造成外交上的严重失误和孤立。”《历史决议》“关于内政错误外交正确的说法，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实际上都是站不住的。”（页379—380）也就是说，在《历史决议》颂扬的这三大特点之中，唯一一个落到实处的独立自主，同样是造假。只不过，造假的方式不同，前两个是把无说成了有，后一个是把非说成了是。

例二，邓小平公开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搞清楚。”“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而毛泽东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何方有问：“既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弄清楚，又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怎么可能说他是中国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中国人人都必须坚持？”（页 751）

例三，后毛时代为了维护毛的地位，“不但不能揭盖子，还必须继续弄虚作假，加以神化。不讲理由，没有任何法理根据，硬是禁止人们回忆和纪念自己亲自经历过的重大事件……为了维持执政地位，不但伪造历史，而且粉饰现实，怕人揭穿，干脆就用专制手法，不准讨论。”（页 788）

2) 党史睁着眼睛造假

党史造假多多，何方举了几个明显的例子。

例一，党史界把延安整风说成是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风，是反对斯大林的教条主义的，实际上“恰恰相反，整风使用的武器正好是他们的著作和文件”。为什么会造出这种假来呢？是因为毛对苏联，对共产国际，对斯大林的态度在五十年代后期发生了变化，从四十年代的无条件拥戴变成了有节制的批评。后来的历史影响了前面的历史，搞党史的用毛泽东五十年代认识，来解释四十年代的整风。

例二，党史上说，是毛发现抢救运动有问题，下令停止，这是没有根据的瞎编。实际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苏共代表季米特洛夫。他给毛发了电报，说康生搞的肃反是从内部瓦解中共，是为国民党服务。毛不得不收手。何方指出，“咱们的党史书和写党史的人，不光是不顾事实，不讲实事求是，而且不怕前后矛盾，不怕别人抓辫子。为什么呢？因为搞党史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明知没人敢抓辫子，就是想抓也找不到一个讲理的地方。这就是写党史的人敢于或不得不睁着眼睛说假话了。”（页 126）

3) 党组织有意造假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张闻天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受张闻天的连累，何方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党宗派集团成员。外交部党委和中央监委给他定的罪名，“不但

没有一句话有根据，而且一些提法也实在有点荒唐”。罪名之一，是说何方反对三面红旗。勉强从人们的揭发中找出的证据是，他讲过大跃进造成比例失调。而这是何方传达薄一波在外交部报告中的内容。之二，是说他“狂妄地要毛主席作检讨”，则提不出任何根据。之三是说他控制部内要害部门，之四说他“在宗派成员中泄露党的最高机密”，更是无稽之谈。之五是翻出他在延安时被打成特务的冤案，把组织搞错的事还当成辫子来抓。

以陈毅为首的外交部的党组成员“大概自己也不一定会相信，那么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十分严酷又不讲根据的结论呢？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欲加之罪。要在外交部凭空制造一个反党集团和若干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否则无法向上交差。不能表白自己和得到好评。推而广之，整个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运动都可以这样看。”（《何方自述》上册，页 341-342）

4) 中央领导人为迎合上意而造假

中央领导人为迎合毛，说过不少假话。而尤以文革时期为甚。何方举例：1967年初，叶剑英在群众大会上多次讲，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毛主席可以活到150岁。说林副统帅除因枪伤使神经稍受损伤外，身体也非常健康。还说，毛林作为马恩、列斯后的国际共运中的第三代搭配，是最合适的，水平也达到高峰。（页 388）

5) 受批判的中央干部为顾全大局而造假

何方披露，彭德怀为了大局，在检讨时也说了假话。《彭德怀自述》说得清楚：“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三十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何方补充说，张闻天也跟彭德怀一样，对专案组采取了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

6) 为自保而造假

在谈到说违心的话和做违心的事的时候，何方告诉人们，在政治运动中，许多人的被迫或奉命去批判别人。”他说他一生中做过两个错事。一是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被

逼无奈承认自己是特务。二是违心地揭发张闻天。这两大深伤巨痛伴随了他的一生。

7) 为过关而做造假

何方举了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林中的例子：1961年9月，外交部按中央的指示搞干部轮训。内容之一是让大家谈反右倾运动。“而且承诺言者无罪”。何方信以为真，对外交部党委给他做的结论，“一桩桩一件件以具体事实进行反驳。”“我在发言中最后概括为一句话，就是‘部党委在反右倾运动中给我做的结论，没有一句话是有充分根据的。’在我发言后，没有任何人提出反驳和更正，确实也没有人公开在会上支持我的发言和要求为我平反。但背后议论中多数人是同意我的申诉的，也有人私下跟我谈过。例如曾经和我一起当过办公厅副主任的林中，就是一个。他不但同意我的发言，也申诉了他的冤枉。”

然而，就是这位林中，在会上则“做了一个没有内容，却表情沉痛的检讨。”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既不说犯了什么错误，更没有讲错误的性质和后果，只是一再空洞地说，自己参加革命这么长时间，还犯这么大的错误，实在辜负了党的培养教育，对不起牺牲的先烈等等。”

说真话的何方被视为另类，以后一直挨整，直至被排挤出外交部。说假话的林中“被认为是态度好，轮训后不久就被派出国当了参赞，文革期间又升任外交部政治部主任。”

（页 405-406）

8) 阿姨教孩子造假

1961年，因长期饥饿而全身浮肿的何方，从安徽农村回到北京，虽然生活大为改善，但仍然老是感到饿。那时，他的大儿子上幼儿园，周六他接大儿子回家时，总要到和平饭店一人吃一盘二两的炒面。“而这个小家伙每次都是吃着他的看着我的，嘴里还一直喊着‘我还要，我还要’。我往往只好忍痛再分他一点。但问到他在幼儿园吃饭情形时，他也和我们下放干部说一样的话：‘吃得饱，吃得好。’只是有时一不留神会偷偷讲，老师让这样说的。可见幼儿园也在教孩子说谎话。”（《何方自述》页 389）。

二、“违心说”是为造假者开脱

造假至少有两种，一种是心甘情愿地造假，一种是违心地造假。前者乐为之，后者不得已。邓小平说周恩来在文革中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意思是周恩来当时是不得已的。因此后人应该原谅他的造假。这种说法被普遍接受，成为人们解释造假的原因之一。何方告诉人们，违心与否是外人无法测知的主观的内心活动，判断一个人是否违心只有两个途径，一是看他当时有无明确的表示，二是看他事后有没有追悔之意并设法弥补。如果没有，那么，就是为造假者开脱罪责。进言之，这种说法就是继续造假——用今天的假话，去掩饰过去的假话。而这种以假掩假的伎俩，在党史中是大量存在的。它为那些做了错事，说了假话的人们提供了道德保护伞，为篡改历史提供了方便之门。

有了这个保护伞，官吏可以为那些丧失了原则的中央大员们挽回面子：他们同意57年打右派，59年反右倾，64年四清，66年发动文革，69年开除刘少奇出党，都是违心的。邓小平也可以把违心也用在自己身上，为他当初举手同意毛的主张辩解。毛泽东也用违心给自己打圆场，说林彪“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他赞成林彪也是违心。

何方指出，就其近距离观察，周恩来打倒刘少奇、拥戴中央文革，喊向江青同志学习，看不出来是违心的，而他抓外交部的“五一六”，制造几千人的大冤案，则是明显的打击报复。邓小平说周恩来违心其实是为周的造假开脱。

何方还指出，主流的说法是，包括毛在内的中央领导人，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是顾全大局，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这不但是为说假话和办错事开脱（躲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且容易混淆是非，搅乱历史，助长弄虚作假的不正之风。”（页560）

三、造假的根子在制度

从何方谈到的各种造假现象中，可以看出，当代中国的造假是全方位的。上面是中央为了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而造假，中间是党政组织为了交差而造假，下面是个人或为了过

关，或为了逢迎，或出于愚忠，或出于从众而造假。

何方指出，造假也好，违心也罢，根子就在制度。“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党带头说假话（反右派的‘钓鱼’，大跃进的‘放卫星’等），于是说假话很快普及到全社会。现在更发展到了说假话成为常规的程度。”（页791）说假话有“一套成文和不成文的体制和规矩”。成文的有两个——

一是服从组织，就是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党的一把手。换句话说，就是对领导对上级负责。这一制度的源头是列宁的建党学说，它的发展是以刘少奇、彭真等人推动的个人崇拜。它的长矛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它的盾牌是中共党章。有了这些东西，把彭德怀、刘少奇锻炼成冤狱不成问题。

二是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共的三大作风之一。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因此，群众的揭发检举，就是证据。有了这一条，制造任何冤假错案都不成问题。

不成文的至少也有三个——

第一个是顾全大局。所谓“大局”，维持领导班子表面的和谐融洽，说到底，放弃正确的意见，违心地服从权力，以便维护本党的利益。何方提到，温济泽在《我在中国社科院的时候》一文中提到周扬提出异化问题后，胡乔木就“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找他谈过三次话，但谈不拢。乔木又找薄一波同他谈，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和中顾委的会议上又有组织地对他进行了批评；最后又派新华社记者要他发表谈话。他无可奈何地说：“我是个老党员，总要顾全大局啊 我不得已承认‘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

当这个班子就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时候，那就成了维持与这个独裁者的友好关系，得到他的信任，以免受到迫害。换句话说，此时的顾全大局，就是保护自己。周恩来在文革中做了好多违心的事，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就是如此。

第二个不成文法是按比例办事。搞政治运动，上级要制订整肃者的比例。如果达不到

这个比例，轻者受批评，重者撤职。因此，在政治运动中，各单位都要免得自己落后。何方谈到，1960年，以陈毅为首的党委未必相信，党委和中央监委给他下的荒谬结论。他们之所以一定要把他往反党上拉，是因为他们要“左右平衡，上下协商”以全国的反右倾的标准和处理办法为参照，与其它单位划右倾的成果做比较，“例如，军队被扣上各种帽子的，有一万七千多人，中央国家机关戴帽子的也有224人，你外交部是张闻天所在的单位，不抓出个反党集团、不划一定数目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行吗？”（页338）。总之，何方被打成反党分子，是外交部党委要向上交差。“推而广之，整个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运动都可以这样看，要不然为什么能够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搞起来，抓出三百六十五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批判的重点对象（当时全党只有二千六百万人）。”（页342）

第三个不成文法是为领导担责任。外交部反右倾，大搞冤假错案。等到落实政策时，被冤的人，要想办法承认自己确实犯有错误。以便给上级下台阶。“一直提倡并教导大家‘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的陈云”，作为西路军事事件的经手人，四十多年来不敢讲真话，直到毛泽东逝世五六年以后才揭露真相。（页561-562）陈云是深谙这些潜规则的。

四、造假之源在延安整风

何方告诉我们，造假之源在延安整风。整风“培植了一种说真话吃亏和说假话占便宜的规矩和风气”。“建国后随着个人崇拜的迅速发展，这股风气也就愈刮愈烈，从农业合作化和大跃进，说假话在某种程度上可说已变成主流作风。”

这棵树是毛泽东亲手种下的——抢救运动打了几万名特务，事后证明，真特务一个没有。而官史宣传的，毛向人们脱帽赔礼道歉，原来也是造假。事实上，毛对抢救运动没有丝毫悔意。而中共中央也没有追究责任。上面说的那些成文和不成文的规矩也由此而生。

“代价论”、“交学费论”、“难免论”、“母亲错打孩子论”也随之而生。■

【何方资料】

一、何方简介

1922年生，男，汉族，陕西临潼人，中共党员。2017年10月3日去世。1938年赴延安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和工作。1945年毕业于延安外语学院俄文系。抗战胜利后去东北，先后任县委宣传部长、省青委副书记等职。1950年随张闻天进外交部，先后任驻苏使馆研究室主任和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1959年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1978年得到平反。之后先任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8年，后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7年。1998年底离休。1991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84年和1994年两次被北京大学聘为兼职教授，1995年又受聘为南开大学兼职教授。1993年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为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1-2000年任中苏、中俄友好协会副会长。本人学术专长为国际问题，中共党史。

二、学术成果

(一) 专著与主编

1. 专著

《群众路线讲座》，东北新华书店辽东分店1949年9月版，2万字。

《人民代表会讲座》，东北新华书店辽东分店1949年12月版，3万字。

《共产党员手册》，东北新华书店辽东分店1950年5月版，6万字。

《驳侵略者口中的“中美友谊史实”》，东北人民出版社1951年2月版，1.5万字。

《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5月版，27万字。

《何方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版，30.4万字。

《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利文出版社2005年4月初版，2008年1月修订版，55万字。

《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明报出版社 2007 年 9 月版，46 万字。

《何方谈史忆人》，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年 10 月版，33 万字。

《争议下的国际问题观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 1 月版，39.6 万字。

《党史真相》，香港大山出版社 2016 年 12 月版，25 万字。

2. 主编过的刊物

《每周通报》(编写，内部，后改名《外交通报》)，外交部，1955—1959 年。

《外事研究》(内部，不定期)，外交部研究室，1955—1959 年。

《外事动态》(半月刊，内部)，外交部办公厅，1955—1959 年。

《业务通讯》(不定期)，外交部办公厅，1956—1959 年。

《日本问题》(双月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1985—1989 年。

3. 主编的书籍和丛书

《苏联问题讨论》(与徐葵合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 6 月版。

《战后日本丛书》(共九册)，航空工业出版社 1988 年 9 月版。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基本问题》(与宦乡合编)，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 4 月版。

《市场经济与国际市场知识丛书》(共七册)，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1 月版。

(二) 研究报告和文章

《关于朝鲜停战的和谈问题》，研究报告，1951 年 6 月。

《评英国的所谓亚洲洛迦诺计划》，研究报告，1954 年 7 月。

《苏联对外贸易的新变化》，研究报告，1954 年。

《苏联宣传中避免突出个人》，研究报告，1954 年 11 月。

《关于美国外交策略的新变化》，《外事研究》1955 年第 1 期。

《有关当前民族独立运动的几个问题》，《国际问题研究》1959 年第 3 期。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速度问题》，研究报告，1977 年 10 月。

《走下坡路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世界知识》试刊第 2 期，1978 年 9 月。

- 《谈谈当前的国际形势》，《世界知识》1979年第3期。
- 《关于中日关系答日本记者问》(日文)《每日新闻》1982年3月27日。
- 《日本经济的当前形势和今后展望》，《国际问题研究》1982年第3期。
- 《对日本修改教科书问题的一些看法》)，研究报告，1982年。
- 《国际形势的回顾与展望》，《世界知识》1983年第1期。
- 《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几点看法》，《世界经济调研》1983年8月27日。获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 《国际形势与台湾之将来》，《台湾之将来》，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3年版。
- 《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就》，《人民日报》1984年9月14日。
- 《论80年代的日本经济形势》，中美(中国社科院和布鲁金斯学会)学术讨论会论文，《日本问题》1985年第1期。
- 《伟大的胜利 深刻的教训——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经济日报》1985年5月9日。
- 《张闻天同志与研究工作》，《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伟大的转折 深刻的教训——纪念战胜日本帝国主义40周年》，《日本问题》1985年第3期。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美国亚洲学会第38届年会上的讲演，1986年3月。
- 《关于参加“台湾未来十年”讨论会和会外接触情况的报告》，1986年4月15日。
- 《台湾、大陆关系之未来》，《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5月5日。
- 《正确对待历史》，《济南惨案》(代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6月版。
- 《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趋势》，《中国青年报》1986年12月26日。
- 《谈谈中日经济关系问题》，《日本问题》1987年第1期。
- 《谈技术文明与现代化》，《日本问题》1987年第1期。
- 《正确对待历史 发展中日友好》，《人民日报》1987年7月6日。

- 《世界经济正处于转折时期》，《人民日报》1987年9月25日。
- 《正确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世界知识》1988年第3期。
- 《日本调整亚洲经济战略的动向值得注意》，研究报告，1988年3月9日。
- 《新形势下的日本和中日关系》，1988年6月29日的一次报告，《形势报告》1988年第6期。
- 《当前世界形势处于重大转折时期》，《世界知识》1988年第18期。
- 《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和调整对外政策的建议》，研究报告，1988年7月25日。
- 《亚太地区安全和日本》，《第53届普格瓦什会议文集》（英文），1988年10月。
- 《关于同南朝鲜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的一些意见》，研究报告，1988年11月14日。
- 《关于战略大三角的淡化问题》，研究报告，1988年11月14日。
- 《关于参加第17届威廉斯堡会议的报告》，1988年12月5日。
- 《走向正常化的中苏关系》，（日文）《朝日新闻周刊》1989年2月7日。
- 《我们所处的时代》《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基本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4月版。
- 《当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关系》，研究报告，1989年12月18日。
- 《新形势下开展对中东工作的意见》，研究报告，1990年2月22日。
- 《如何看待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研究报告，1990年3月12日。
- 《张闻天与新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张闻天研究文集》第一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6月版。
- 《9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人民日报》1991年2月7日。
- 《过渡时期的国际形势》，《国际贸易论坛》1991年第6期。
- 《世界格局与世界经济》，《国际商报》（英文）1991年第46期。
- 《苏联八月事变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影响》，《理论动态》1991年11月5日。
- 《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研究报告，1991年12月14日。
-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趋势》，研究报告，1991年12月20日。

- 《利用日美矛盾，调整对日政策》，研究报告，1991年12月25日。
- 《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1991年第11期、1992年第1期。
- 《为什么说国际形势对我有利》，《理论动态》1992年。
- 《过渡时期国际形势的若干问题》，原为内部研究报告，后刊登在《1992年国际形势年鉴》和《国际展望》1992年第2—4期。该文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
- 《处于转折中的国际形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外交季刊》（英文）1992年6月。
- 《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与合作的新阶段》，《亚太经济》1992年第5期。
- 《中国日本研究的三次高潮》，《光明日报》1992年9月5日。
- 《正确认识我国当前的国际环境》，《国际贸易论坛》1992年第3期。
- 《冷战后的国际形势》，《人民日报》1992年12月16日。
- 《冷战后的日本对外战略》，《外国问题研究》1993年第2期。
- 《冷战后的东亚形势》，《环球企业家》1993年第3期。
- 《关于国际关系中主要矛盾的通信》，《世界经济与政治》1993年第5期。
- 《冷战后亚太地区的大国关系——关于中日美新三角》，《理论动态》1993年7月10日。
- 《亚洲的崛起》，《世界知识》1994年第1期。
-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新阶段》，香港《建设与投资》1994年第2—3月号。
- 《南北差距的新变化》，《世界知识》1994年第8、9期。
- 《以积极态度迎接经济全球化新高潮》香港《世界经济》1994年10月号。
- 《关于亚太经济形势与安全问题的研究》，《当代国际问题研究》1994年第3期。
- 《时代问题和亚洲的作用》，（俄文）《远东问题》1994年第5期。
- 《关于亚洲经济形势》，《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4年第9期。
- 《中国今后五年的对外政策走向》，中美知名人士第7次会晤论文，1994年10月。

- 《21世纪初中国国际环境的若干思考》，《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3期。
- 《21世纪的亚太与中国》，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外交季刊》（英文）1995年5月。
- 《世界经济的发展高潮和格局变化》，《发展论坛》1995年第6期。
- 《适应时代潮流 坚持和平发展》，《光明日报》1995年8月15日。
- 《联合国的改革与日本》，《日本学刊》1995年第5期。
- 《南北关系的新变化及其发展趋势》《人民日报》，1995年8月5日。
- 《当前的国际安全形势》，《现代国际关系》1995年第11期。
- 《我在辽东同张闻天同志的接触》，《张闻天在辽东》，中央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
- 《世界经济发展的新高潮和新格局》，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外交季刊》（英文）1995年12月。
- 《谈“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国际贸易论坛》1996年第2期。
- 《世纪之交的亚洲安全形势》，《太平洋学报》1996年第4期。
- 《日本面临第三次历史性转折》，《21世纪中国与日本》，1996年10月版。
- 《国内外经济发展中应引起注意的若干现象和问题》，《国际贸易论坛》1997年第1期。
- 《我们能同日本友好下去吗？》，《环球时报》1997年5月11日。
- 《〈现代日本政治〉序言》，《现代日本政治》，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7月版。
- 《地区经济一体化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4期。
- 《大国关系的调整与多极化发展》，《光明日报》1997年11月29日。
- 《一年来南北关系的变化和发展》，《人民日报》1997年12月28日。
- 《有关东亚金融危机的几个问题》，《解放日报》1998年2月9、10日和3月12、13日。
- 《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香港《中国评论》1998年第2期。
- 《是多极化还是“一超多强”？》，《世界知识》1998年第17期。

- 《有关经济全球化的十个问题》，《太平洋学报》1998年第3期。
- 《迎接中日关系发展的新阶段》，香港《中国评论》1998年9月号。
- 《〈跨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序》，《跨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9月版。
- 《两大世界主题和邓小平理论的时代背景》，《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年第2期。
- 《国际问题研究中的几个观念问题》，《理论前沿》1999年第3期。
- 《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发展阶段和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太平洋学报》1999年第2期。
- 《不可动摇对国际形势的根本判断》，香港《中国评论》1999年7月号。
- 《构筑中日关系的第三个千年》，《日本学刊》1999年第4期。
- 《研究日本，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日本学刊》2000年第1期。
- 《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国际展望》2000年第1期。
- 《科索沃战争及其影响给我们的启示》，《21世纪初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2000年5月。
- 《世界早已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3期。
- 《历史要真实——谈遵义会议确立的党中央领导》（纪念张闻天同志百年诞辰），2000年3月。
- 《遵义会议为什么没有提政治路线问题》，2000年6月。
- 《“遵义会议决议”到底是怎样起草的》，《炎黄春秋》2000年第9期。
- 《谈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职务》，《随笔》2001年第1期。
-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是不是总书记》《炎黄春秋》2001年第1期。
- 《牢牢把握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炎黄春秋》2001年第7期。
- 《送刘英大姐西行》，《炎黄春秋》2002年第10期。
- 《增进中日间的相互理解与信赖》，《东北亚学刊》2003年1月。

《读有关康生的两篇文章所想到的》，《文史精华》2003年第2期。

《沉痛悼念李慎之同志》，《炎黄春秋》2003年第6期。

《张闻天的民主追求与实践》，《炎黄春秋》2003年第7期。

《再谈党史文章的抄来抄去现象——答刘明钢同志的“商榷”》，《文史精华》2003年第8期

《延安整风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部分内容发表于美国《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春季号，第十二卷第一期总第八十八期。

《我们心中的耀邦——胡耀邦是“五四”传统的伟大继承者》《炎黄春秋》2005年第6期。

《党史研究中的反思》，《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

《从陈独秀张闻天到胡耀邦》，《炎黄春秋》2006年第6期。

《我看社会主义》，《炎黄春秋》2007年第7期。

《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回顾与思考——写在“十月革命”九十周年之时》，《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

《自由是民主的前提——推进民主是第一要务，专家学者笔谈“两会”》，《炎黄春秋》2008年第5期。

《走在艰难平反路上的一年》，《炎黄春秋》，2008年第6期。

《以改革公车制度支援抗震救灾》，《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

《改革开放三十年》，《北方期货投资专刊》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特刊，2008年第3期总第13期；后又发表于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

《胡耀邦与民族区域自治——改革开放初期胡耀邦在民族自治问题上的拨乱反正》，见《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12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晨钟书局2009年4月，第56-79页。

《对时代问题的两种不同判断及其后果》，《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

- 《对资中筠文章的几点补充》《炎黄春秋》2010年第3期。
- 《全球化的几个问题》，《炎黄春秋》，2010年第5期。
- 《悼念朱厚泽同志》，《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
- 《周恩来张闻天外交风格异同》，《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
- 《一定要解决好民主化问题》，《炎黄春秋》2011年第7期。
- 《在历史决议发表30周年讨论会上的发言》，2011年8月27日。
- 《时代问题十讲》，“超星名师讲座”录制，文字稿载于《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9、10、11期。
- 《建国初期外交上的两条路线》，《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
- 《时代判断有误就会危害全局——一本国际问题讨论文集的前言》，《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
- 《中国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教训》，《炎黄春秋》2013年第9期。
- 《抗美援朝的得与失》，《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
- 《感谢〈世界知识〉对我的帮助》2014年9月，《世界知识》2014年9月第18期。
- 《李一氓的政治人生——李一氓书法选》2013年10月15日《炎黄春秋》2014年2期。
- 《虽不同行却相知》——敬贺张大律师90华诞，2016年9月20日，《律师文摘》2014年第1期，总第57辑。
- 《李一氓回忆录》再版序，2014年10月7日。
- 《萧军在延安》，《炎黄春秋》2015年第1期。
- 《沉痛悼念曾彦修同志》，《炎黄春秋》2015年第4期。
- 《曾彦修来信类抄》，《炎黄春秋》2015年第10期。
- 《三点意见——在〈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的发言》，《炎黄春秋》2015年第5期。
- 《深切的怀念——〈张培森文集〉代序》，2015年5月9日。
- 《我看日本和中日关系》，《炎黄春秋》2015年第12期。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在祝贺周有光老人 111 岁华诞座谈会上的发言》

2016 年 1 月 10 日发言，2 月 2 日成稿。

《刘英谈红军时代》，《炎黄春秋》2016 年第 1 期。

《刘英回忆延安岁月》，《炎黄春秋》2016 年第 4 期。

《刘英回忆晚年张闻天》，《炎黄春秋》2016 年第 6 期。

《研究国际问题的缘起和心得》，《炎黄春秋》2016 年第 7 期。

（三）其他

《双城县永乐村调查》，《东北农村调查》，东北书店 1947 年 3 月版。

《重印〈台湾府志三种〉序》，中华书局 1985 年 5 月版。

《杰出的学者 深厚的友谊》，《人民日报》1987 年 2 月 21 日。

《有泽广巳先生与中国》，《人民中国》1987 年第 8 期。

《也谈点自学的体会》，《名家谈自学》，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宦乡在最后的日子里》，《文汇报》1989 年 4 月 2 日。

《〈模糊的荧屏〉不模糊——纪念李一氓同志诞辰 90 周年》）《人民日报》1993 年 2 月 8 日。

《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仪式上的讲话——我的研究工作简况和几个学术观点》，1994 年 6 月 10 日。

《驳所谓张闻天“反总理”——澄清外交部 1958 年务虚会的一些情况》，《百年潮》1999 年第 8 期。

《释放刘志丹与痛说三门峡》，《同舟共进》2004 年第 2 期。

《庐山会议前后的张闻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口述历史》，2005 年 1 月。

《沉重的反思——写在〈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出版之际》

《炎黄春秋》2005 年第 7 期，题目改为《党史研究中的反思》。

《自由是民主的前提》，《炎黄春秋》2008 年第 5 期。

《支援抗震救灾 改革公车制度》，《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

《何方谈中日关系60年》，（腾讯网视频：2009年8月19日）。

《驳熊蕾对张闻天的诬陷》，发表于《香港传真》No. 2011-11, 2011年3月7日。

《接受杨伟东访谈》，采访时间：2010年7月17日，发表于杨伟东主编：《立此存照：500位中国人的心灵记录》第一卷下册，2011年7月出版。

《缅怀一代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纪念张闻天诞辰110周年》，《领导者》总第34期，2010年第6期。

《中国当代启蒙的关键是破除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2010年7月4日在“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发表于资中筠著《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一书，第158-16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

《一颗伟大的心停止了跳动》（悼念朱厚泽同志），《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

《对几个重大问题的认识》，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11年8月连载四日。

《从北非中东革命看七十年来的世界潮流》（马国川访谈），《财经》2011年8月28日，发表时题目改为《政治民主化潮流第四波》。

《亲历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转折》（丁东、鲁利玲访谈），《人物》2011年第8期。

《在日本所两次聚会上的发言》，《东北亚学刊》2011年第2期。

《在日本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日本研究战线上一个老兵的几点希望）》，《日本学刊》2011年第3期。

《应为社会主义正名》——马国川访谈，发表于FT中文网，共识网转载，2011年12月26日。

《中苏同盟的历史启示》——马国川访谈，《财经》2013年4月1日。

【何方著作馆藏】

从延安一路走来：何方自述 /

Cong yan an yi lu zou lai : He fang zi shu

Author: 何方 (1922.10-) 何方著. ; Fang He

Publisher: 人民日报出版社, Beijing : Ren min ri bao chu ban she, 2015.

Edition/Format: Print book : Chinese : Di 1 banView all editions and formats

Database: WorldCat

Rating: (not yet rated) 0 with reviews - Be the first.

Subjects Shi xue jia -- Zi chuan -- Zhong guo -- Xiandai.

He fang(1922-)

1.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Library

Vancouver, BC V6T 1Z1 Canada Book 2400 miles

2. 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ies

Stanford, CA 94305 United States Book 2500 miles

3. Hangzhou Library

杭州图书馆

Hangzhou, Zhejiang, 310016 China Book 7400 miles

4.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U Libraries

Hong Kong, Hong Kong Book 8000 miles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基本问题 /

Dang dai shi jie zheng zhi jing ji ji ben wen ti

著者: 主编宦乡 ; 副主编何方. 宦乡. 何方, Xiang Huan; Fang He

出版商: 世界知识出版社 : 新华书店经销, Beijing : Shi jie zhi shi chu ban she : Xin hua shu dian jing xiao, 1989.

版本/格式: 电子图书 : 文献 : 中文

主题 World politics -- 20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 20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1.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ies

New York, NY 10027 United States

2.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New Haven, CT 06520 United States

3.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20540 United States

4.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20052 United States

5. Harvard University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Cambridge, MA 02138 United States

6. HathiTrust Digital Library

Ann Arbor, MI 48109 United States

7.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MI 48109 United States

8.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

Urbana, IL 61801 United States

9. Shanghai Library

Shanghai, 200031 China

10. Guangzhou Library

Guangzhou, 510055 China

11.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 T., Hong Kong

12.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U Libraries

Hong Kong, Hong Kong

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 /

Dang shi bi ji : cong Zunyi hui yi dao Yan'an zheng feng

Author: 何方, 1922- 何方著. Fang He

Publisher: 利文出版社, Xianggang : Li wen chu ban she, 2008.

Edition/Format:eBook: Document : Chinese : Xiu ding banView all editions and formats

Database: WorldCat

Rating: (not yet rated) 0 with reviews - Be the first.

Subjects Zhongguo gong chan dang -- History.

China --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 20th century.

Zhongguo gong chan dang.

View all subjects

.Library Held formats Distance

1.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System

NYPL

New York, NY 10018 United States Book 7 miles

2.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ies

New York, NY 10027 United States Book 9 miles

3.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Princeton, NJ 08544 United States Book 50 miles

4.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ibraries

Van Pelt Library

Philadelphia, PA 19104 United States Book 89 miles

5. HCL Technical Services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Cambridge, MA 02139 United States Book 181 miles

6.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Ithaca, NY 14853 United States Book 182 miles

MAP IT Library infoSearch at this libraryAsk a librarianAdd to favorites

7. Harvard University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Cambridge, MA 02138 United States Book 182 miles

8.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20540 United States Book 210 miles

9.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ittsburgh, PA 15260 United States Book 321 miles

10. McGill University Library

Montreal, QC H3A 0C9 Canada Book 331 miles

MAP IT Library infoSearch at this libraryAsk a librarianAdd to favorites

11. University of Toronto East Asian Library

Toronto, ON M5S 1A5 Canada Book 350 miles

12. Duke University Libraries

Duke University Library; Perkins Library

Durham, NC 27708 United States Book 427 miles

13.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Chapel Hill, NC 27514 United States Book 434 miles

14. Ohio State University Libraries

Columbus, OH 43210 United States Book 486 miles

MAP IT Library infoSearch at this libraryAsk a librarianAdd to favorites

15. HathiTrust Digital Library

Ann Arbor, MI 48109 United States Book 523 miles

16.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Ann Arbor, MI 48109 United States Book 523 miles
17.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Chicago, IL 60637 United States Book 718 miles
18. Chicago Public Library
Harold Washington Library Center
Chicago, IL 60605 United States Book 720 miles
19.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General Library System
Madison, WI 53706 United States Book 816 miles
20.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St. Louis, MO 63130 United States Book 887 miles
21.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inneapolis
Minneapolis, MN 55455 United States Book 1000 miles
22. Rice University
Fondren Library
Houston, TX 77005 United States Book 1400 miles
23. University of Texas Libraries
University of Texas Libraries
Austin, TX 78713 United States Book 1500 miles
24.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Harold B. Lee Library
Provo, UT 84602 United States Book 1900 miles
MAP IT Library infoSearch at this library Add to favorites
25. University of Arizona Libraries
Tucson, AZ 85721 United States Book 2100 miles
MAP IT Library infoSearch at this library Ask a librarian Add to favorites
26.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Langson Library
Irvine, CA 92623 United States Book 2400 miles

2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CA 90095 United States Book 2400 miles
2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UCR
Riverside, CA 92521 United States Book 2400 miles
2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UC San Diego Library; UCSD Library
La Jolla, CA 92093 United States Book 2400 miles
30.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Seattle, WA 98195 United States Book 2400 miles
31. 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ies
Stanford, CA 94305 United States Book 2500 miles
32. UC Berkeley Libraries
Berkeley, CA 94720 United States Book 2500 miles
33.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UCSB Library
Santa Barbara, CA 93106 United States Book 2500 miles
34. University of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
London, WC1H 0XG United Kingdom Book 3400 miles
35.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Hamilton Library
Honolulu, HI 96822 United States Book 4900 miles
36.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KBU Library
Kowloon, 00000 Hong Kong Book 8000 miles
37.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U Libraries

- Hong Kong, Hong Kong Book 8000 miles
38. University of Auckland, General Library
Auckland, 1010 New Zealand Book 8800 miles
39.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TU Libraries
Singapore, 639798 Singapore Book 9500 miles
40.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Canberra, ACT 2600 Australia Book 10100 miles
- .41.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Library
Baillieu Library
Parkville, VIC 3010 Australia Book .42. Murdoch University
Murdoch, AU-WA 6150 Australia Book 11600 miles

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 /

He Fang tan shi yi ren : ji nian Zhang Wentian ji qi ta shi you

著者：何方，1922- 何方著. ; Fang He

出版商：世界知识出版社, Beijing : Shi jie zhi shi chu ban she, 2010.

版本/格式： 打印图书 : 传记 : 中文

主题 Zhang, Wentian, -- 1900-1976.

Statesmen -- China -- Biography.

China --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 1949-1976.

1.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ies

New York, NY 10027 United States

2.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20540 United States

3.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 Directorate

Washington, DC 20540 United States

4. Minuteman Library Network
Natick, MA 01760 United States
5. HCL Technical Services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Cambridge, MA 02139 United States
6. Harvard University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Cambridge, MA 02138 United States
7.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Chicago, IL 60637 United States
8.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
Urbana, IL 61801 United States
9. University of Texas Libraries
University of Texas Libraries
Austin, TX 78713 United States
1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UCR
Riverside, CA 92521 United States
1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CA 90095 United States
12. 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ies
Stanford, CA 94305 United States
13. UC Berkeley Libraries
Berkeley, CA 94720 United States
14. Nanjing Library
南京图书馆
Nanjing, Jiangsu, 210018 China
15. Shanghai Library

Shanghai, 200031 China

16. Hangzhou Library

杭州图书馆

Hangzhou, Zhejiang, 310016 China

17. Guangzhou Library

Guangzhou, 510055 China

18.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U Libraries

Hong Kong, Hong Kong

19.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TU Libraries

Singapore, 639798 Singapore

20.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Canberra, ACT 2600 Austra

何方杂谈 /

He Fang za tan

Author: 何方, 1922- [何方著]. Fang He

Publisher: [Place of publication not identified] : [publisher not identified], [2011]

Edition/Format: Print book : Biography : Chinese View all editions and formats

Database: WorldCat

Rating: (not yet rated) 0 with reviews - Be the first.

Subjects Zhongguo gong chan dang -- History.

China --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 20th century.

Zhongguo gong chan dang.

View all subjects

1.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ies
New York, NY 10027 United States Book 9 miles
2.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New Haven, CT 06520 United States Book 63 miles
3. HCL Technical Services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Cambridge, MA 02139 United States Book 181 miles
4. Harvard University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Cambridge, MA 02138 United States Book 182 miles
5.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20540 United States Book 210 miles
6. University of Toronto East Asian Library
Toronto, ON M5S 1A5 Canada Book 350 miles
7. 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ies
Stanford, CA 94305 United States Book 2500 miles
8. UC Berkeley Libraries
Berkeley, CA 94720 United States Book 2500 miles
9. Shanghai Library
Shanghai, 200031 China Book 7300 miles

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 2 Cong yan an yi lu zou lai de fan si : he fang zi shu 2

Author: 何, 方 He fang zhu ; Fang He

Publisher: 明報出版社 Xianggang Ming bao chu ban she 2008

Series: Er shi yi shi ji wen ku

Edition/Format: Print book : Chinese : Di 2 banView all editions and formats

Database: WorldCat

Rating: (not yet rated) 0 with reviews - Be the first.

Subjects He, Fang, -- 1922-

Zhongguo gong chan dang -- Biography.

Zhongguo gong chan dang

1.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System

NYPL

New York, NY 10018 United States Book 7 miles

2.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ies

New York, NY 10027 United States Book 9 miles

3. HCL Technical Services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Cambridge, MA 02139 United States Book 181 miles

4.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Ithaca, NY 14853 United States Book 182 miles

MAP IT Library infoSearch at this libraryAsk a librarianAdd to favorites

5.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20540 United States Book 210 miles

6. University of Toronto East Asian Library

Toronto, ON M5S 1A5 Canada Book 350 miles

7.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Chapel Hill, NC 27514 United States Book 434 miles

8. Ohio State University Libraries

Columbus, OH 43210 United States Book 486 miles

MAP IT Library infoSearch at this libraryAsk a librarianAdd to favorites

9.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MI 48109 United States Book 523 miles

10.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Chicago, IL 60637 United States Book 718 miles
11.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inneapolis
Minneapolis, MN 55455 United States Book 1000 miles
12. Rice University
Fondren Library
Houston, TX 77005 United States Book 1400 miles
13.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s Angeles
John F. Kennedy Memorial Library
Los Angeles, CA 90032 United States Book 2400 miles
1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CA 90095 United States Book 2400 miles
1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UC San Diego Library; UCSD Library
La Jolla, CA 92093 United States Book 2400 miles
16. Palo Alto City Library
Library Administration
Palo Alto, CA 94301 United States Book 2500 miles
17. 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ies
Stanford, CA 94305 United States Book 2500 miles
18. UC Berkeley Libraries
Berkeley, CA 94720 United States Book 2500 miles
1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UCSB Library
Santa Barbara, CA 93106 United States Book 2500 miles
20. Staats- und Universitätsbibliothek Hamburg Carl von Ossietzky
Hamburg, 20146 Germany Book 3800 miles
21. Universität Zürich

University of Zurich

Zürich, 8057 Switzerland Book 3900 miles

22. Tamkang University Library (TKUL)

Chueh Sheng Memorial Library

Tamsui Taipei, 25137 Taiwan Book 7700 miles

23.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KBU Library

Kowloon, 00000 Hong Kong Book 8000 miles

24.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U Libraries

Hong Kong, Hong Kong Book 8000 miles

25. University of Auckland, General Library

Auckland, 1010 New Zealand Book 8800 miles

26.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TU Libraries

Singapore, 639798 Singapore Book 9500 miles

27.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Canberra, ACT 2600 Australia Book 10100 miles

28. Murdoch University

Murdoch, AU-WA 6150 Australia Book 11600 miles

何方自述：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 /

He fang zi shu : Cong yan an yi lu zou lai de fan si

Author: 何方. [何方著]. ; fang He

Publisher: [出版者不详], [Chu ban di bu xiang] : [Chu ban zhe bu xiang],
[2011]

Edition/Format: Print book : Biography : Chinese : Di 1 banView all
editions and formats

Database: WorldCat

Rating: (not yet rated) 0 with reviews - Be the first.

Subjects He fang -- Zi chuan.

.1.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ies

New York, NY 10027 United States Book 9 miles

2.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New Haven, CT 06520 United States Book 63 miles

3. Harvard University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Cambridge, MA 02138 United States Book 182 miles

4. University of Toronto East Asian Library

Toronto, ON M5S 1A5 Canada Book 350 miles

5.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General Library System

Madison, WI 53706 United States Book 816 miles

6. 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ies

Stanford, CA 94305 United States Book 2500 miles

7. UC Berkeley Libraries

Berkeley, CA 94720 United States Book 2500 miles

8. Shanghai Library

Shanghai, 200031 China Book 7300 miles

论和平与发展时代 /

Lun he ping yu fa zhan shi dai

著者: 何方. 何方著. ; Fang He

出版商: 世界知识出版社, Beijing : Shi jie zhi shi chu ban she, 2000.

版本/格式: 电子图书 : 文献 : 中文

主题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 1995-2005.

World politics.

1.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ies
New York, NY 10027 United States
2.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20052 United States
3. HCL Technical Services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Cambridge, MA 02139 United States
4.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MI 48109 United States
5.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Library
Vancouver, BC V6T 1Z1 Canada
6. UC Berkeley Libraries
Berkeley, CA 94720 United States
7. Staats- und Universitätsbibliothek Hamburg Carl von Ossietzky
Hamburg, 20146 Germany
8.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9. Shanghai Library
Shanghai, 200031 China
10. Guangzhou Library
Guangzhou, 510055 China
11.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 T., Hong Kong
12.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U Libraries

Hong Kong, Hong Kong

争议下的国际问题观察 /

Zheng yi xia de guo ji wen ti guan cha

Author: 何方, 1922- author. 何方著. Fang He

Publisher: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Beijing: Zhongguo she hui ke xue chu ban she, 2013.

Series: Zhongguo she hui ke xue yuan xue bu wei yuan zhuan ti wen ji.

Edition/Format: Print book : Chinese : Di 1 ban View all editions and formats

Database: WorldCat

Rating: (not yet rated) 0 with reviews - Be the first.

Subjects World politics -- 20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1.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Ithaca, NY 14853 United States Book 182 miles

MAP IT Library infoSearch at this library Ask a librarian Add to favorites

2.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20540 United States Book 210 miles

3.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 Directorate

Washington, DC 20540 United States Book 210 miles

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CA 90095 United States Book 2400 miles

5. 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ies

Stanford, CA 94305 United States Book 2500 miles

6. UC Berkeley Libraries

Berkeley, CA 94720 United States Book 2500 miles

7. Nanjing Library

南京图书馆

Nanjing, Jiangsu, 210018 China Book 7300 miles

8. Hangzhou Library

杭州图书馆

Hangzhou, Zhejiang, 310016 China Book 7400 miles

9. Guangzhou Library

Guangzhou, 510055 China Book 8000 miles

何方集 /

He fang ji

著者：何方。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Fang He; Zhong guo she hui ke xue yuan ke yan ju.

出版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Beijing: Zhong guo she hui ke xue chu ban she, 2001.

丛书：Zhong guo she hui ke xue yuan xue zhe wen xuan.

主题 He fang -- Wen ji

Zhong wai guan xi -- Wen ji

Guo ji wen ti -- Wen ji

1.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System

NYPL

New York, NY 10018 United States

2.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Ithaca, NY 14853 United States

3.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20540 United States

4. Harvard University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 Cambridge, MA 02138 United States
5. University of Toronto East Asian Library
Toronto, ON M5S 1A5 Canada
6. Duke University Libraries
Duke University Library; Perkins Library
Durham, NC 27708 United States
7.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IN 47405 United States
8.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Chicago, IL 60637 United States
9. University of Iowa Libraries
Iowa City, IA 52242 United States
10.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Library
Vancouver, BC V6T 1Z1 Canada
1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Langson Library
Irvine, CA 92623 United States
12.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CA 90095 United States
13. 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ies
Stanford, CA 94305 United States
14. UC Berkeley Libraries
Berkeley, CA 94720 United States
15.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Cambridge, CB3 9DR United Kingdom
16. Shanghai Library
Shanghai, 200031 China

17. Guangzhou Library
Guangzhou, 510055 China
18.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KBU Library
Kowloon, 00000 Hong Kong
19.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U Libraries
Hong Kong, Hong Kong
20.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Singapore, 188064 Singapore
21.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U
Canberra, AU-CT 0200 Australia

（“何方著作馆藏”系原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陈远焕先生提供，谨此致谢）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2008年9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方惜辰

本期校对：郭予庆

封面设计：寒于冰